

18
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清末民初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研究

作者姓名 陈虹

指导教师 方新德 副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所在学院 人文学院

提交日期 2007年5月

目录

内容提要.....	1
Abstract.....	2
绪论.....	3
第一章 传统家族教育的地位.....	7
第一节 家族教育在家族活动中的地位.....	7
第二节 在教育事业中家族教育的地位.....	8
第二章 清代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情况.....	10
第一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观念.....	10
第二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办学活动.....	11
第三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训文化教育.....	15
第四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科举盛况.....	18
第五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学文化.....	23
第三章 教育转型过程中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	25
第一节 家族教育变革的背景.....	25
第二节 嘉兴地区望族对科举制和新学的各种态度.....	26
第三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办学活动.....	26
第四节 嘉兴地区望族在转向新式教育后取得的成就.....	29
第五节 清末民初嘉兴地区望族新旧家族教育并存的情况.....	34
第四章 传统家族教育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的影响.....	38
第一节 教育观的转变.....	38
第二节 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39
第三节 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40
结语.....	45
参考文献.....	47

内容提要

浙江嘉兴历来是人才的摇篮，在这之中更有一些人才辈出的望族。在传统社会，嘉兴望族的教育活动，长期以来对家族本身的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到了近代，嘉兴得风气之先，其望族适时转变教育观念，积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族人接受新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型人才，同时也为嘉兴近代教育最终取代传统教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本文以浙江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嘉兴地区各个望族的家谱、地方志、文史资料以及名人传记等资料，围绕传统和近代家族教育各自的内容、特点为主题展开具体论述，并对比分析了两者在教育观、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上的不同，以期对嘉兴望族的家族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变迁过程作一番考察，从中探讨整个嘉兴地区教育在近代的转型。

关键词：家族教育 传统 近代

Abstract

The Jiaxing District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always a cradle of talent , there are some distinguished families which have many talented persons in their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se prominent familie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se families as well as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up to the neoteric times, Jiaxi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ethos first, its prominent families transformed the educational ideas at the right moment, organized new-style schools positively, encouraged household members to accept the new-style education, trained large quantities of modern talented people, meanwhile, they have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neoteric education 's substit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Jiaxing.

This dissertation takes the prominent families' household education of Jiaxing as the researchful object, utilizes each family's genealogy 、 local chronicle 、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well as celebrities' biographies, circumfuses the traditional and neoteric family educations' respective content、 the characteristics to launch the concrete elaboration for the subject, and contrastivel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educational styles in education views、 the influence on families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 and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we hope to depict the vicissitude of household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imes to neoteric times and scan the neoteric transformation of Jiaxing's local education.

Keywords: Household education Tradition Neoteric times

绪论

一、选题缘起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在其内外部所展开的文化教育活动,即家族教育,长期以来充当了私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传递与教育的推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教育功能是官方教育所无法取代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家族教育往往是给本家族的子弟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便于他们通过读书进入官僚阶层,以保持家族的长期兴盛。到了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数千年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开始在人们心中动摇。家族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受到西学的巨大冲击,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变革的历程。家族开始鼓励和资助族人进入新式学堂,甚至参与留学教育。同时,家族中的开明绅士和进步知识分子热心办学,他们凭借家族本身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较高的社会声誉和人才优势,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由于大家族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在地方上也有较大势力和影响,因而其教育观念的转变,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始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取向,这为中国近代教育最终取代传统教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样的一种转向过程,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考察。

浙江嘉兴是人才的摇篮,在这之中,更有众多人才辈出的望族。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列出了嘉兴 91 个望族¹。而且嘉兴地区紧邻上海、杭州、苏州等大城市,在近代以来,又得风气之先,较早地受到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现代学者吴大琨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²显然,这里说的“代表性家族”即指望族。故要研究清末民初嘉兴地区教育的转型,首先必须弄清楚这一时期嘉兴望族的教育情况。因而本文以“清末民初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研究”为课题,试图通过研究浙江嘉兴地区望族家族教育及其变迁历程,来探讨该地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为明晰本文的研究主题,需要对家族、望族、家族教育的概念及特点作一个明确的界定。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以其独有的婚姻形态将个体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家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诸多家庭联系起来,并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共居于同一个地理空间内(如居于同一个村落)。

望族,是指通过其成员的努力或社会遗传而形成的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的家族,一般在地方上有较大的势力和影响。本文所研究的望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久远的家族历史。如嘉兴谭氏³“始迁祖仲斌公,由山阴徙嘉兴,迄今已四百余年矣”⁴。

其次,相当的规模。如海宁朱氏⁵,据族谱记载,“自元至正年间迁居海宁之湖塘里,族属繁衍散处城乡袁硖各镇”⁶。

第三,相对的稳定性和地域性。如嘉善徐氏⁷,“自子达公以下,世居善邑……为一邑之

¹ 详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一书,由于明清时海宁属杭州府,潘光旦把海宁作为嘉兴府境外论,对其望族的统计并不完整,只列了陈氏、查氏、陆氏三家。其实,嘉兴地区望族的数量远不及此。

² 吴大琨:《笔谈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11期。

³ 嘉兴谭氏于北宋末年由河南迁浙江,五世仲斌公谭定于明初由山阴徙嘉兴胥山,入秀水县籍。

⁴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首,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⁵ 海宁朱氏系出先贤宋徽国文公后,自元至正年间朱濬迁居海宁之湖塘里,族属繁衍散处城乡袁硖各镇。

⁶ 《海宁朱氏宗谱·序》,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⁷ 嘉善徐氏出自安徽之绩溪,始迁年代不详。

望者”¹。

第四，文化和人才。如嘉兴金氏²，“子孙繁衍，人才不乏”³，族中金德瑛曾高中状元。海盐张氏⁴，“以耕读传家，文章理学，代有闻人”⁵。

第五，良好的道德。如海盐张氏“先世……积德累仁，久为乡党所推重”⁶。

对于这样的家族，除了“望族”这个通常的称呼外，还有其他一些称号：

世家。《闻湖盛氏家乘》：“吾宗系数百年礼仪世家。”⁷

巨姓。《海宁州志稿》：“州中巨姓，若查若陈。”⁸

旧族。《海宁朱氏宗谱》：“吾邑旧族十余家，率皆诗书。”⁹

著姓。《洛唐周氏家乘》：“周氏出自姬姓，唐时为汝南著姓。”¹⁰

家族教育，则是以本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等众多方面，它担负着家族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的重任。家族教育一般以家训和族学为其主要形式，此外，还包括父兄以言传身教的形式教育子弟，也有大家族内长辈对晚辈的教育。本文所研究的家族教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既包括以一族为单位，也包括以望族内单个家庭为单位的教育。

二、文献综述

家族教育在中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然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家族教育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及论文也相继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丁钢主编的《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¹¹，该书通过对晋商、徽商、闽粤商人、江浙商人的专题研究，探索了经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党明德、何成主编的《中国家族教育》¹²一书，既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家族教育的产生、发展、特点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又针对不同家族的特点进行分类专题研究。此外，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¹³，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¹⁴，李国均、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¹⁵以及侯玉杰、冯美荣、刘雪燕、张利民合著的《滨州杜氏家族研究》¹⁶等论著中，部分篇章也论述到了家族教育。而常建华的《宗族志》¹⁷，讲到了宗族结构与组织、族谱、族产、族学、族规等，为家族教育提供了部分史料。

在论文方面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可以分为家族个案的研究、某一时代的研究以及某一个地区的研究，但同时，这三方面的研究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关于家族个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城王氏、流坑董氏、桐城张氏等几个家族上。主要成果有：张发祥《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¹⁸，何成的《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¹⁹。

¹ 《徐氏家乘·序》，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² 嘉兴金氏原居杭州，十五世都御史公德瑛为秀州汪氏婿，遂入嘉兴秀水籍。

³ 《金氏如心堂谱》，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⁴ 海盐张氏自明初迁海盐，聚族而处，支姓繁衍。

⁵ 《张氏族谱·序》，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⁶ 《张氏族谱·序》，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⁷ 《闻湖盛氏家乘·祭规》，清宣统三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⁸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三·学校上》。

⁹ 《海宁朱氏宗谱·序》，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⁰ 《洛唐周氏家乘》首一卷，清道光七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¹ 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¹² 党明德、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¹³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

¹⁴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¹⁵ 李国均、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¹⁶ 侯玉杰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

¹⁷ 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¹⁸ 张发祥：《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抚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¹⁹ 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学海》，2002年第1期。

两文都是从两级性的家族教育目的这个角度论述。而李浩在《桐城张氏家族教育传统试探》¹中从为人之道、持家之道、为官之道等方面来研究家族教育。

关于某一时代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李必友的《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²,卢丽琼的《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的兴盛》³,宋之问的《宋代家族教育论述》⁴,王善军的《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⁵,许永涛的《清代族规家训的社会功能》⁶,韩凝春的《清代江浙族学研究》⁷。而在近代方面,林济的《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⁸一文,通过考察国民政府时期两湖新族学的民间组织特点,探讨了新族学与乡村宗族的关系问题。韩凝春在《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⁹一文中,通过论述旧式族学的基本内容和特色、江浙族学在学制变革期的演变和发展、新式族学的文化价值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学制变革以前的“旧式族学”与变革中的江浙族学作了初步的勾勒与比较。

关于某一地区的研究,主要以南方和北方为划分依据。在研究成果上,由于南方地区的家族教育是十分兴盛的,它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家族、一个地区,而是对整个南方地区乃至全国都有所波及。因此,对南方地区家族教育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多,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吴霓的《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¹⁰,钟春翔的《简析清代江南的家族教育》¹¹,这两篇论文研究的共同点是作者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明清时期,家族教育包含了广泛性的教育和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这两方面的内容,并把科举入仕作为家族教育的热点来研究。和南方相比,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家族教育研究相对薄弱,主要研究论文有:张杰的《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¹²,以清代北方地区为例,从家族传统、地方师资与从事教育形式三个方面,论述了科举世家在发展地方教育中的作用及影响。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历来有关家族教育的研究,大多仅仅关注传统社会家族本身的教育组织形式,对家族教育在清末民初这个历史转型时期的发展、变迁情况,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选择嘉兴地区的望族为研究个案,对该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过程作一个详细的考察。希望通过本人的努力,能对本课题的研究做些微薄的贡献。

三、研究史料和题目说明

本文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嘉兴地区各望族的家谱、地方志、文史资料以及名人传记等。

本文选择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原属杭州府的海宁现属嘉兴地区,整个经济、文化环境与嘉兴各地相似,而且海宁境内的望族与嘉兴地区其他的望族有着血缘、婚姻等多方面的联系,故本文所研究的嘉兴地区也包括海宁)。所取时间段从清到民国,在这一时期内,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家族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变迁。本文把时间的下限定在1919年,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清末民初是家族教育大变革的“分水岭”,之后随着时局的变迁直至解放,家族教育的改革虽然远未终止,但仍沿袭了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近代家族教育的基本格局。

¹ 李浩:《桐城张氏家族教育传统试探》,《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

² 李必友:《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³ 卢丽琼:《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的兴盛》,《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4年第2期。

⁴ 宋之问:《宋代家族教育论述》,《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⁵ 王善军:《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⁶ 许永涛:《清代族规家训的社会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八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⁷ 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⁸ 林济:《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⁹ 韩凝春:《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

¹⁰ 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¹¹ 钟春翔:《简析清代江南的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¹² 张杰:《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

在本文所选取研究的嘉兴地区望族中，文化和人才是其一个突出特点。因而嘉兴望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家族，而是有着其内在文化质量的家族。而且越是这样的家族，对家族教育就越为重视。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指出，嘉兴的望族平均能维持二百多年，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兴望族家族教育的成就。因而研究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也就有了一定的意义。

¹ 详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94—96页。

第一章 传统家族教育的地位

第一节 家族教育在家族活动中的地位

一、家族教育是家族得以传承的重要事业

在中国传统社会,“世之所传者二,有血脉之宗,有道脉之宗。血脉之传有显有微,有绝有续,唯有道脉,才能世代永续。”¹所谓“血脉”是指家族的传承,所谓“道脉”是指文化的传承。

中国人浓厚的家族观念,使家族的传承成为至关重要的事。家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把血脉和道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相互依赖。他们认识到,要维持家族的传承,不能只关心族众的生存、家族人口的繁衍,还必须依靠文化的传承。“振家声,绵祖德,要惟以培养子弟为第一着”²,家族的文化精英们认为家族的发展与壮大,必须依靠与祖宗同心同德的贤能子孙。而家族教育,正是培养这些子孙的重要手段,也是家族承前启后的一项重要事业。

在此基础上,平湖朱氏³深有感触地提出:“教家之道,敬祖宗为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则家礼行;家礼行,则百事举。”“谨按先祖,兄弟承生,高祖遗训,为立身行事之本……合族子姓,登堂瞻封,时加警心。”⁴家族正是通过家法族规的形式,将祖宗兴教立品、子孙读书立身的信念灌输于族人心中,成为恪行不悖、世代相传的祖法。把教育子弟读书成才,视作家族存亡的大事,认为“读书明理,究竟知礼义廉耻之大防。……苟书香一断,数世以后,将有不可问者矣”⁵。因而,家族对子孙最深切的希望,莫过于读书做官,光大门楣,“读书入官报国树嘉绩于彤庭,流芳声于青史,斯不虚上天生我之心”⁶,充分体现了家族先祖对子孙殷切的企盼之心。嘉兴竹林庙高氏⁷提出家族“修德则昌,败德则亡,故欲子孙之昌盛,莫如积德以培之”⁸。这种德报之说的实质,在于先祖通过教育子孙读书做人,培养子孙担负起家族存亡的重任,把家族传承作为族人共同的信念,并在家族自然繁衍的过程中,反复实践证明。随着家族的发展,家族文化也随之根深蒂固,反过来又促进了家族的兴盛。因此,家族教育正是延长家族生命的一个重要方式。

二、家族教育是一项家族文化整合活动

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置族田,兴义庄,设族学,从而使家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上加强了整合和自治。

人才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家族在其制度上,为一个人的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多数家族普遍设有族学,鼓励族人读书,甚至还为入学的族人提供一定的经济奖励,“塾中子弟所有伙食以及纸墨笔砚书籍等项,均由庄置办外,东塾该经费,每月给钱二百文,作文者三百文;西塾子弟每月给钱一百六十文”。⁹在家族活动中,各个家族也十分尊重人才,积极发挥其社会价值。家族不仅用本族文化人教育族中子弟,“延吾族品端学粹者为童子师”¹⁰,而且放手让他们撰修谱牒,记录和弘扬家族历史。更重要的是,家族把族中

¹ 尧新瑜:《试论流坑董氏家族教育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抚顺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²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³ 平湖朱氏于康熙中太高祖中翰公明仪从月谭迁浙,占籍桐乡,其子高祖药房公再迁平湖。

⁴ 《朱氏重修迁浙文谱·诵芬录》,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⁵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⁶ 《安化王氏宗谱》卷二《家训》,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

⁷ 嘉兴竹林庙高氏为宋烈武王后,扈蹕南渡,居浙江;宋亡,迁徐州萧县;明初高逊志再迁居嘉兴,为竹林高氏之始。

⁸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⁹ 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¹⁰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惟修学励行出其才能，或致力于社会，或宣劳于国家”¹的优秀人才，在修谱时大书特书，使之成为族人学习的榜样和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人物。

作为家族特有的文化整合活动，家族教育还被纳入统一的家族赡养机制中。海宁陈氏²“乃割三十亩，岁取租入，佐义田之不足。俟义田少拓，即耑以延良师训九族弟子”³。海宁祝氏⁴“置田亩，添义塾”⁵。海盐任氏“置义田，构家塾，聚族中之俊秀者读书于中”⁶。此类记载，不绝于谱，表明在传统社会，对族人予以经济赡养和文化教化，是家族建构的重要内容。在其家训文化中，家族教育与恤孤寡、助婚丧等家族活动，是在家族经济许可和家法族规界定的范围内，试图安排族人的生活，使族人生有所养，长有所教，死有所归。家族文化的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家族亲情和家族力量的凝聚。

三、家族教育是敬宗收族的重要手段

家族为保障其自身利益和地位，对族人开展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

嘉兴望族常说“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⁷。收族，必先收族人之心，而家族教育正是基于此的一项努力。嘉兴谭氏提出，“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四书经史皆可，以闲其邪心，而兴其善念”⁸。平湖朱氏也认为“读书……求其明理”⁹。这种面向族中子弟的广泛性教育，重在宣传忠信孝悌等伦理道德观念，以仁、义、礼的方式，延续家族的传承，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秩序。同时，各个家族都竭力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高子孙的文化素养，为族人的治生谋得适宜的道路，“农商工贾各守一业”¹⁰。族人基本文化需要的普及，以及族中优秀子弟的科举入仕，促进了家族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因而，家族教育是一种通过文化而达到自强的家族活动。

在家族的发展过程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是家族内部等级分化的根源，也是造成“乱族”现象的根本原因。作为敬宗收族的重要手段，敦伦、睦族，也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族中贫富不均的现象，要做到“勿因荣盛而忌之，勿因穷困而欺之”¹¹。家族还劝导富人出资办学，当“同派子孙，束修无措”时，“有力者，招来教育”¹²。义学的设立，使族中贫寒子弟也能得到读书入仕的机会。于是，族中贫富等级对立的矛盾，让位于家族一脉相承的发展共识。

第二节 在教育事业中家族教育的地位

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观念，使家族社会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和缩影。家族成员不仅构成了经济生活的共同体，在政治上也是祸福相依、荣辱与共。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个人进取目标。治家有方是古代社会鉴别贤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治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家族教育，以维系家族的延续和发展。

两汉开了经学、技艺传家的先河，家世传授往往成为学术和技艺延续的主线索，家族教育由此兴起。之后，随着家族的迅速成长壮大，到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世族控制朝纲的局面，家族成员的名声直接影响着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同时，在当时社会，文化在社会评价

¹ 《平湖徐氏世系·序》，民国五年石印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² 海宁陈氏本姓高，元末，族人高谅入赘于由安徽歙县迁来海宁的陈家。其子荣开始改母姓，但仍用父姓的郡望，称渤海陈氏。

³ 《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终《义学志》，民国二年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⁴ 海宁祝氏于元时由三五公自括苍徙海昌，至十一世起家。

⁵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⁶ 《任氏宗谱·海盐任氏家塾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⁷ 《当湖王氏家谱·序》，民国六年排印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⁸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⁹ 《朱氏重修迁浙支谱·诵芬录》，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⁰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¹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²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家族中的经学根底也直接影响着家族的声望。因而,在这种形式下,家族教育十分兴盛。此后,家族教育一直长盛不衰,始终担负着家族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的重任。

家族教育,作为私学的一种形式,在教育事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所办的学校一般只到县一级,虽然地方上也有一定数量的书院和社学,但家族教育在承担读书识字、洒扫应对等基本文化知识传授的任务上起着独特的作用。钱穆曾说:“就中国文化史而言,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¹家族教育也是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而存在,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嘉兴的望族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认为家族教育“有塾以教之,有规以约之,有田以贍之恤之,亦是补国家政教所不逮矣”²。

而且在古代中国,家族还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女子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最早的教育环境是家族。自古以来,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启蒙教育,认为“教子孙幼时最为要紧”³,这对子弟一生的成长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一个家族的文化素养,能在家族成员身上普遍反映出来,这种文化氛围对幼儿的培养和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古代选官以儒家文化为主,重人文而轻科技,反映在官学教育上也是如此。家族教育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选官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是自然科学和技能等传播的重要阵地,甚至是最主要的途径。技艺、医学、民间信仰等的技术和文化,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冷落和轻视而失传,反而通过家学的传承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这不得不归功于家族教育。在嘉兴的望族中,就有陈木扇医学世家⁴等。

中国古代女子地位的低下,致使其不可能像男子一样接受学校教育,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没有女子教育,只是这种教育都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的。虽然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对女子德行的说教,其知识面也十分狭窄,所传授的技艺也主要局限在书画等方面,但毕竟使她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这对女子的为人处事以及一生的成长都是极为重要。在有的望族中,由于受家族文化的熏陶,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如海宁查氏家族⁵,就出了查惜、查昌鹓、查映玉、查瑞抒、查蕙缀、查若筠等不少闺阁诗人。⁶

由此可见,传统的家族教育在古代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¹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63页。

² 《平湖徐氏世系·序》民国五年石印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³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⁴ 陈木扇医学世家,子孙世代以医为业。北宋末年,陈沂迁钱塘,稍后,子孙迁居海宁。现其分支遍及海宁、桐乡、嘉兴,以妇科名噪浙北。

⁵ 海宁查氏,周时封于查,后以地为氏。元代至正年间,查喻由婺源迁来海宁袁花龙山定居。

⁶ 详见洪永铿、贾文胜、赖燕波:《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

第二章 清代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情况

一个地区的家族教育,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社会与人文环境。因而研究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首先必须考察一下该地区各方面的环境情况。

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腹心地带,东接上海,北邻苏州,西连杭州、湖州,南濒杭州湾,属于长江三角洲富庶的地区之一,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促使嘉兴地区的望族可以相对减少用于谋生的时间,而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文化精神方面的活动。经济的发达使望族能在文教事业上有较多的投入。同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使家族能够从容地考虑家族内部发展的问题,把家族教育提到家族发展的日程上来。尤其嘉兴号称“文化之邦”,素有重文兴教的传统。海盐士人“学务宏博,文擅典雅”,即便是田野小民,“皆知教子孙以读书为事”。¹查慎行在描述海宁的文教之风时,也曾说“吾邑旧族十余家,率皆诗书”²。文教之风的熏染,也有助于家族文化教育功能的培育和发挥。

第一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观念

有清一代,嘉兴地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嘉兴地区的望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这与嘉兴地区以及嘉兴地区的望族重视文化教育有关,他们认为“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³。

第一,家族教育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观念,促使统治者采取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正是基于这种方式,人们把“敬宗收族”看得非常重要。为了家族的延续传承,各望族都非常重视用家训、家规来教育本家族成员,利用各种形式对家族成员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认为“孝弟廉耻,无不由读书而兴”。⁴

同时,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不仅在于这个家族人数的多少,更主要的在于他人人口素质的高低。特别是在科举制下,一个家族通过祖上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其声望和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世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做到“代有闻人”,而关键就在于教育。

嘉兴的许多望族认为,教育是自己家族兴起的根本原因。在“家业日增”后,必须“课子若孙”,使其“家声再振”。⁵这成为嘉兴望族的基本认识。

海宁祝氏是当地的望族,据《海昌祝氏宗谱》记载,“吾邑祝氏,袁花四姓之一也……簪纓勿替,代有传人”⁶,出过祝渊、祝潜、祝翼良、祝瑄等名人。祝氏家族认为自己家族的兴起在于教育,“吾先世以力学起家”,他们要求其家族成员能够“累世相承”,保持读书这一家族传统,认为“子孙虽愚,读书不可不读,振家声,绵祖德,要惟以培养子弟为第一着”。⁷

任何一个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盛衰兴亡不可避免。对嘉兴的望族来说,抓好族中子弟的教育,是家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父兄者,若能恳切以训子弟,则家虽败,可以复兴”。⁸而家族最担心的是族中子弟不思进取,告诫子弟“凡人一生,不过读书、做人、作家三件事,然不读书,必至游荡,一游荡,必至破家”。⁹

¹ 光绪《海盐县志》卷八《輿地考五·风土》。

² 《海宁朱氏宗谱》卷首《原序》,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³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⁴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⁵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⁶ 《海昌祝氏宗谱》卷首《海昌祝氏重修宗谱序》,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⁷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⁸ 《干氏宗谱·家训八箴》,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⁹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嘉兴高氏把家族兴衰归之于族中子弟接收文化教育的程度。把“读书香”列为家训之一,认为“苟书香一断,数世之后,将有不可问者矣”。¹高氏对教育的重视,使其家族在明清两代成为著名的“文宦之家”。

海宁查氏家族的发展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查氏始迁祖查喻于元末定居海宁,致力于耕读。一百多年后,查焕于弘治三年(1490),考中进士,开始了查家登科甲之路。有明一代,查家中进士者6人,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连中进士,查家逐渐成为海宁乃至江南地区的望族。清代,仅康熙一朝就有10人中进士,查慎行、查嗣琛、查嗣庭兄弟三人相继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为查家的鼎盛时期。但雍正四年(1726)的文字狱,使查家遭受沉重打击,元气大伤。27年后,查氏家族通过坚持不断地开展家族教育,查虞昌于乾隆十九年(1754)考中进士,家族又开始复兴。

第二,家族教育是子弟谋生的需要。

家族的发展和振兴,离不开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成员。嘉兴的望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把培养人才作为教育的重要功能,认为“所以培植子弟得所人才成就,即为宗族之光”²。即使一般的谋生,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为了生存,各望族都很重视品德、技艺等的教育。

“无论质之愚敏,教以读书,能为圣贤事业者,上也;克振家声者,次也;否则教以保家之道,安分守己不坠先业者,又其次也;否则教以经营之术,农商工贾各守一业者又次之。”³这不仅考虑到了家族需要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够提升家族的名望和地位,同时也为族中一般子弟谋生需要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兴的望族重视教育,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的气质,特别是在人的早期教育中,教育对一个人习性的养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许多望族都把培养个人的修养作为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海宁祝氏的几位先贤分别教育族中子弟说“古人教子,自小可使颀德,不可使颀利,道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律之以严,习之以礼,积善以培植之,积学以滋润之”,以及“读书非不欲取高第,显门闾……惟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便衣冠言,勋望而知为圣贤路上人,此是真正读书”。“祖宗相传,有世守之业,读书,我家之世业也。自古闻失教之禽兽,未闻不学之圣贤。要做好人,必须读书”。⁴认为读书能培养人的性情,改变人的气质,使人具有足够的修养。这样,家族就达到了其教育的基本目的。

家族教育是最直接和最基本的教育,嘉兴望族的这种教育观念,使族中子弟无论材质,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可以说嘉兴能成为人才的摇篮,不能不说是其家族重视教育的结果。

第二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办学活动

家族办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据《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⁵是人们对先秦教育体制构成的扼要概括,这里的“塾”、“庠”、“序”、“学”就是不同级别教育机构的名称。塾,《说文解字》解释为“门侧堂也”⁶,也就是说,最早的家族学堂一般建在大门以内的侧堂,延师教子,具有私家教育的因素。家族办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大户人家自设学塾专门教育子女;另一类是家族利用其自身的力量开办学塾,教育族中子弟。宋以后,伴随着地方家族组织的繁荣和家族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家

¹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² 转引自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³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⁴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⁵ 转引自《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终《义学志》。

⁶ 转引自党明德、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族办学日益兴盛，一般命名为义学、义塾或家塾。本文统一称为族学。

嘉兴地区，具有悠久的家族办学传统，是族学的繁荣兴旺之地。本文根据地方志等资料的记载，选取了嘉兴地区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族学，制成下表。

嘉兴地区族学事例表

族姓	名称	县属	创办人	设置时间
陶氏	义塾	嘉善		元代
吴氏	义塾	嘉善	吴森	元代
濮氏	义塾	桐乡	濮鉴	元大德年间
冯氏	义塾	海盐	冯梅轩	元天历年间
戴氏	义塾	嘉善	戴光远	元至正六年
陆氏	天心书院	平湖	陆光宅	明隆庆年间
徐氏	肃成书院	秀水		明代
陈氏	义塾	秀水	陈振声	清嘉庆七年
魏氏	义塾	嘉善	魏行误	清嘉庆年间
于氏	义塾	嘉兴	于行	清道光三年
程氏	义塾	嘉善	程学洙	清道光九年
钱氏	义学	嘉善		清代

资料来源：1、光绪《嘉兴府志》（一）卷八《学校一》，卷九《学校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2、光绪《嘉兴县志》卷五《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3、光绪《平湖县志》卷三《建置上·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4、民国《濮院志》卷八《教育》，《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5、宋立宏主编《海盐县教育志》（上）第三章《儒学 书院 学塾》，海盐县教育局，1990年。

6、县《教育志》办、文史办：《明清时期嘉善的旧学》，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第5—6页。

族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生源的把握、师资的选择、学制情况以及族学管理等几个方面。

族学对学生的来源有一定的要求，相应地反映在族学的形态上，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面向全体宗族适龄子弟的族学。此类记载亦多，海宁祝氏“延师设教于乡贤祠内，无论幼童弱冠，俱可从学”。¹海盐张氏“祠中附设家塾，教授阖族子弟”。²海宁查氏“设家塾训诸孙。”³由于族学是家族所建，在生源的选择上一般带有排他性的特点，有的家族为此特别指出，如嘉兴姚氏义塾规定：“此塾为培植宗族子弟而设，外姓不得附入，惟外甥有实系贫而无靠者，须推姊妹同胞之谊，准其入塾，此外无论内侄表亲，不能援以为例。”⁴可见，姚氏除对贫困无靠的外甥网开一面外，其他外姓是不能入学的。二是面向本族内贫寒而无力上学者的专门性族学，这种族学具有“义”的性质。如海宁许氏“立义塾以课贫家子”⁵；海宁朱氏家族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子孙有掇科第登仕藉者，谅力蠲田若干，积租息以助贫

¹《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²《张氏族谱·宗祠总章》，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³《海宁查氏族谱》卷九《志状》，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⁴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⁵《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卷十二《墓志铭》，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而有志读书者。”¹三是专门面向族中优秀子弟的族学。由于优秀子弟的教育对于家族科举的成败具有直接意义,因而,有的族学对生源严格把关,认为“家塾所以造就人才也,族繁人众,愿学心同,恐浮泛慕名,滥收多取,非经久切实之道。”²因此,只有“才质颖异及沉静好学者,同族周知,愿入家塾,于每岁开课日报名附录,果能不虚所闻,使准入塾。”³这样经过层层选拔,又资质不凡的子弟,必然会为家族的科举事业作出一番贡献。还有一些义学,除招收本族子弟外,也兼收乡里子弟,如海宁朱氏除“设家塾以课子”外,还“延名师于家,广开池馆,招四方贤士,诵读其中”⁴。

族学还对学生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如嘉兴姚氏“子姓十岁以外,资质聪颖可能造就者,从东师学,以六人为式,……子姓十岁以内及十岁外愚钝者,从西师学,以八人为式,至多限以十人”。⁵

族学十分重视师资的选择,认为“师,所以模范人伦者也”⁶;“成德育才,师儒是赖”⁷。对师资的选拔和考察,有的望族任用族人,有的则选择聘用外姓,但其择师的基本标准是品德高尚、举止端方、学问优秀,要求教师能为人楷模,起到表率作用。海宁祝氏“延吾族品端学粹者为童子师”⁸;嘉兴姚氏也提出“如族中有品端学粹堪为师表者,不论辈次,亦可延请”⁹;而海盐任氏则是“访请有学有品之儒以主讲席”¹⁰。对选定之师,各望族都赋予训课、责罚的权力,而最基本的内容是要求族师倾囊相授,使族中子弟日有所长,优秀者能早日登科及第。因此,族人都十分重视族师,“凡人教训子孙,必先尊重师傅”¹¹,“塾中一切学规,悉禀师训”¹²。此外,望族还向族师“供膳给修”,嘉兴姚氏族师的报酬为每年60—80千文。¹³

在学制上,族学多为蒙学,嘉兴高氏对蒙学的教授有专门的规定,“课蒙之法,先识方字二千。认字易,则读书成诵亦易。未作文,先作试帖诗。”¹⁴但有较强经济文化实力的望族则“义塾中延经、蒙二师”¹⁵,采取两级施教制度。因此,族学教育也分为两部分:一般族中子弟的文化普及教育和部分优秀子弟的科举教育。通常,家族普遍根据子弟的材质实施不同的教育,认为,“子孙当因材施教,质美则读书上进,其以致君泽民”¹⁶,不然,“亦须使其粗知义理,而不至入于下流”。¹⁷嘉兴姚氏就设有东、西两塾,分别用不同的课业进度,教授“子姓十岁以外,资质聪颖可能造就者”和“子姓十岁以内及十岁外愚钝者”,西塾子弟至十一岁,“读书能有进益者,即宜升至东塾,将东塾之读书难选者,为之更换”,¹⁸这样一来,既保证了东塾子弟的教育质量,还在子弟中形成了互相竞争的良好学习氛围。对于族中子弟的学习年限,一般族学也有其规定。嘉兴姚氏义塾规定:“至十五、六岁而不能造

¹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²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³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⁴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二《行状》,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⁵ 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⁶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⁷ 《洛塘周氏家乘》卷二《宗约·附家规》,清道光七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⁸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⁹ 转引自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¹⁰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¹¹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²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¹³ 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

¹⁴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课蒙一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⁵ 《洛塘周氏家乘》卷二《宗约·附家规》,清道光七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⁶ 《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卷十二《墓志铭》,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⁷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⁸ 转引自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就读书者，宜早乎学习商业。”¹嘉善顾氏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定：“若十八九岁学业勿进，宜早令别治生理。”²

族学一般设在宗祠内，“祠中附设家塾”，³以及“设教于乡贤祠内”⁴。在其日常管理上，一般由专门的家族人员负责，“塾中所给出自义田，即应管理义田之人，掌塾中一切诸事，稽查课程，检验出入，亦其专职，倘有营私徇隐诸弊，公举议罚”⁵。在其教学管理上，家族要求子弟专心学习，对族学中的一些不良行为，必须作出惩罚。“戒庞杂。家塾专为读书，塾中子弟亲友往来各有私室，倘私自容留或饮酒游谈，恐以庞杂扰乱课程，违者议罚”，“禁外务。为学之道，心思精力凝聚一处，始得成功，如有非塾中事，群聚谈论或分力经营，皆为外务，违者议罚”，“惩败类。去良莠，所以养嘉禾也。塾中如有携带赌具引诱同学，三五成群夜深相聚，或借端出外交结匪人，作为不端，不许复入家塾。”⁶这就保证了族学教育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学生能够一心一意地学习。

此外，为检验族中子弟的课业进度和教学质量，家族制定了严密的监管和定期抽查、考察的督课或会课制度，“严考课。分别优劣专在考课，每逢文期，请师评定甲乙。三次居首者议赏纸笔，以示优奖，三次居末者议罚”。⁷家族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族学的教育质量，希望族中子弟能在学习上时时进取。海宁祝氏家族的《家课规约》⁸，就在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规定：

吾先世以力学起家，累世相承，惟以读书振其家声。现逢院试，体先人启佑之谟，必给卷费。为子姓者，更宜刻苦用功，各期仰副。因公议复设会课以为培植计，今开规条于后：

课费。每次面课，其费在西荃存贮账取给。毋烦学者自备。课地以神游阁为佳，不惟接居高敞，即各支造课各亦经捷。

课期。每岁面课四次，春清明，夏端午，秋中元，冬十月朝。先期，族尊出传单以定课期。每月传课三次，以初五、十五、廿五为期，如面课日规避不到，甘于自弃者，不准给卷费。

课日。各支作文者，限期辰刻齐集，申刻交卷，无论日短日长，不准给烛，其日两点心一午饭，命题监课及作文者，大约以三桌为则。

面课。各带笔砚韵本，早至课所。命题后各归坐位，用心作文作诗，不许出位言谈，有妨功程。作完即行缴卷。各劲所长，不得舞弊等弊，致貽悔误。

传课。每月逢五日各自走领题目，仍限即日楷誉，次日交卷。俟阅后同课人自行传看无许课外私传，其课本仍存执笔处，俟下次面课各自检领，不得先行擅抽，庶可观其进步。

看文。每年四面课，每月三传课，评定甲乙，批示理法。虽体先人启佑之意，实为后学分外增劳。每岁酬金作四次，嘱承管送交，庶使学者心安。

会课后，学者果能奋志有为，应州府试名列案首者给钱三千文，如在十名前给半，倘在二十名前亦量给半，以示奖励。

族学一般的经费来源是祠田和义田的收入，也有热心于家族文化事业的士绅自己出资，或捐钱、或捐粮、或出地，为家族子弟延师办学。嘉兴地区的望族为保证其教育经费来源有一定的稳定性，基本上都设有学田或义田，以其收入开办族学，资助族中子弟教育和科举之用。如海宁陈氏“乃割三十亩，岁取租入，佐义田之不足。俟义田少拓，即崇以延良师训九

¹ 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1—402页

² 《顾氏新谱·遗训》，2004年电脑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³ 《张氏族谱·宗祠总章》，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⁴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⁵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⁶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⁷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义田规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⁸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族弟子”。¹平湖陆氏²也“置塾讲业，族里子弟群焉，买田二百以给饩廩，谓之学田”³。海宁朱氏家族也规定：“读书一切费用酌立规条以时资助。”⁴

第三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训文化教育

端蒙学，重家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家族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家训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又称家诫、家约、家范或家规，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和繁荣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它是把宗法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作为教育内容来指导家族成员如何处理家族关系、如何做人的训诫。家训主要借助通俗的表达方式，以家书、家谱、宗祠等为媒介，一般通过文字的形式世代相传。家训的教育目的明确，针对性强，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作用。纵观嘉兴地区的望族文化，其内容涉及的面比较广，但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到修身、勉学、齐家、睦族、治生几个方面。

一、修身

修身，是为人的基础。“人之有身，受之父母，而其要必先自立。”⁵众多的家族都倡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求族人要养成良好的品行，杜绝各种恶习。

孝亲敬长。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孝是为人之本，“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可见爱亲敬长是天性之事。”⁶“凡和宗睦族之道，必始于孝弟。”⁷很多家族强调“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⁸对于孝贤子孙，众多的家族都予以褒奖，对于不孝子孙，大多予以惩罚。“孝弟忠信，善者奖之，恶者戒之，愚者谕之。”⁹

率先垂范。家长，是一个家族的领袖人物，其一言一行，对族人的影响较深。因而，家长必须起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家长之身，一家之所观法也。其身未修，而欲上下严肃，内外和平，理实难也。故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大则纲常伦纪，小则视听言动，皆当天以诚敬，罔敢怠忽，则邻里且闻而感服，而谓举家之人犹不奉令承教，未之有也，凡有家者，必其返己自修也可。”¹⁰“祖父之教子孙，以身教，亦以言教。”¹¹

志向高远。“人之立志，当自幼小。”¹²立志是做人的根本，传统家训十分强调“立志”对家族年轻一辈的作用，认为“惟志不立，实是无著立处”¹³，在确定了志向后，必须向先贤学习，努力奋进，在此过程中，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¹⁴。这样，就能达到“志立则定，从此进德何德不成，从此修业何业不就”¹⁵的地步。

谨慎择友。朋友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凡子弟不亲正人，则必入匪类。”交友不当，会使年轻人沾染不少恶习。因而不乏家训规定，严禁子弟与地痞、流氓结交。“交友当慎择人品，酒肉之交，所损非细，不可不察也。”¹⁶

同时，众多望族严禁子孙游手好闲，沾染各种恶习。“器凌是败家之本，游惰是贫贱之

¹ 《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终《义学志》，民国二年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² 平湖陆氏世居平湖。

³ 转引自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1—392页。

⁴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⁵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⁶ 《朱氏重修迁浙支谱·诵芬录》，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⁷ 《干氏宗谱·家训八箴》，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⁸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卷二十《遗言》，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⁹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⁰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¹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卷二十《遗言》，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²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卷二十《遗言》，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³ 《朱氏重修迁浙支谱·诵芬录》，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⁴ 转引自《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⁵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卷二十《遗言》，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⁶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根。”¹“好嫖多损寿，岂谨伤财，爱赌必倾家，非徒犯法，饮食太侈，亦败家之道，衣裳过度，非惜福之方，他若左道旁门以及写状健讼，均为有害身家。”²因此，他们对游荡无赖的族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游荡好闲，不务生理，嫖赌偷窃，伤风败俗者，初则宗长族人到家劝勉，喻以礼法，次则祠堂责惩，令其自新，若怙恶不悛，据情送官、出族。”³

二、勉学

大多数望族都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文化教育，除开办族学外，勉学则是家训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所有的家训都有涉及。

望族把读书作为世业，要求“子孙善守勿替”⁴，勉力保持读书这一家族传统。

嘉兴望族十分重视早期教育，规定儿童一定要接受知识。海宁朱氏就有如此规定：“教子孙幼时最为要紧”⁵。海宁查氏也在其家训中说“戒尔诸孙，凡为童稚，读书为本”⁶。这种家族对其子弟所进行的早期教育，对子弟一生的成长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他们以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读书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对于个人来说，读书能够“道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⁷，使人明是非，知礼义廉耻，“不为大奸恶之事”⁸。嘉兴众多望族还认为“要做好人，必须读书”⁹，把读书与做人紧密联系起来。

族人亲自参与子孙的教育，教授学习方法。望族中一批重教劝学的族人，凭借自己在知识等方面的优势，不遗余力督导子弟读书，甚至亲自训督课读，“不得观书无序，博涉不专”¹⁰，“读书不可读死书”¹¹。海宁朱氏的族谱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家居多暇，恒以课孙自娱，招戚支中子弟之英俊者，一堂督课，俾其切磋，时时训以为学立身之要。”¹²及“辟一经堂，东野草堂望徽楼，俾子孙诵读其中焉。”¹³

三、齐家

家庭是家族的细胞，大多数望族对本家族内各家庭的事务都会加以干预，因而在家族的家训文化中，都有对齐家之道的规范。“齐家之道，通乎治国平天下，而其要不过有三，曰德、曰礼、曰法。曷言乎德，修身是也，曷言乎礼，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分是也，曷言乎法序，不容紊别、不容乱分、不容踰违，则有罚是也。”¹⁴

居家要仁厚，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相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义而和，妇顺而正，家庭之常道备矣。”¹⁵但同时，各个家族十分重视尊卑长幼的关系。

作为家长，必须“爱其子，而使子弟弗我亲亲之过也”¹⁶，治家应该“存公平正大之心，不可稍有偏袒，又必整齐严肃，使幼不陵长，疏不间亲”，从而使家中的“一举一动，秩然有序，而家道庶由此兴焉”¹⁷。

¹ 《干氏宗谱·家训八箴》，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²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³ 《顾氏新谱·遗训》，2004年电脑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⁴ 《张氏族谱》卷之首，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⁵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⁶ 《海宁查氏族谱》卷十三《家训》，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⁷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⁸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⁹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⁰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¹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²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二《行状》，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³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¹⁴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⁵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⁶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卷二十《遗言》，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¹⁷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很多家训强调兄友弟悌,要求众兄弟和睦友爱。“友于兄弟,和于长幼”¹,这是因为嘉兴众多望族都认为兄弟间的和睦,有利于家族的兴旺。而兄弟间的良好关系往往要以妯娌间的和睦为前提,因此各望族都要求“夫为妻纲,何至听信妇言。”²在一般家训中,妯娌和睦是家族对妇女提出的正面要求,认为“薄待夫兄,薄待夫弟,即薄待夫父母也”³。因而“妯娌间不许说是说非,兄嫂弟媳当相见以礼”⁴。

治家严谨,要养成勤劳节俭的生活原则。勤劳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各望族都主张以节俭为治家理财之本。“饮食太侈,亦败家之道,衣裳过度,非惜福之方。”⁵“子孙家常饮食衣服不可过,用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切忌饮酒。”⁶但望族虽提倡节俭,但也反对吝啬,“治家不可苛细”。⁷

和善邻里关系,善视仆隶。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因而,望族都十分重视处理好邻里关系,不少家训要求族人和睦乡邻,宽容以待,而且要体恤贫弱。“齿高者尊之,流寓者惜之,耕必让畔,坐必让席,戒多言,以免后悔,忍小忿,以息争端,弗损人以利己,弗暗箭以伤人。”⁸在对待仆人问题上,也“不得虐使僮婢”⁹,但为避免家族是非,也要注意“弗听萋菲之仆”¹⁰。

四、睦族

调整家族内部的关系,促进家族成员之间的和谐,是家训文化的又一个方面。

众多的家训文化都强调,族人应该互相关心和帮助。这是因为全族之人,不管亲疏远近,都是始迁祖一人的后裔,“支派虽远,究是一脉相延”¹¹。因此,作为同一个先祖的后人,应该“盖谊切同宗情如一体,勿因荣盛而忌之,勿因穷困而欺之”¹²。族中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族人都应积极参与。“亲亲之要,助婚丧,以彰孝友之道、仁厚之谊。”¹³“克敦雍睦,至于嫁娶丧葬,尤宜尽心所愿,百世常如一日。”¹⁴

睦族还特别体现了对贫苦族人的帮助和救济。很多家训规定,对于生活困苦的族人,特别是孤寡老人和小孩,有余产的族人应该时常周济他们。“哀孤独,以拯流离之苦。”¹⁵“提携孤弱,周恤饥寒,亦分所应尔。”¹⁶有的家族“置买祭田,作为公产”¹⁷,以其收入作为族人的救济基金。

五、治生

众多望族要求子弟务正业,传统社会讲治生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把勤俭持家作为治生的重要手段,“勤与俭,治生之道也,勤以补拙,俭以养廉。”¹⁸二是把读书做官当作治生的手段。在望族中,有较多的子弟通过科举等途径踏上了仕途。这些望族的家训文化中往往要求为官的子孙清廉、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我子孙若登仕籍,毋沽虚名,毋贪高位。

¹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²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³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⁴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⁵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⁶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⁷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⁸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⁹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⁰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¹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²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¹³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⁴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⁵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⁶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⁷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¹⁸ 《朱氏重修迁浙支谱·诵芬录》，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致君泽民，须以实心行实政。”¹海宁查氏家族《官箴》记载：“往矣忠勤，毋忘国恩，按公于中丞之，之官而勸之，教忠也。呜呼！移孝作忠，不忠非孝，凡我子孙，前徽宜绍。”²朱氏家族也对子弟为官之道有如下的认知：“功名二字，不是徒为富贵而已，上为国，下为民，之谓功，为良臣，做好官，之为名。”³忠孝意识的灌输，还在于保证族中子弟将来科举入仕后，能够效忠国家，不致于损害家族的声望。因而，对于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的贪官、奸臣，家族都有一定的惩罚。“苟不顾造孽于后嗣，而徒知求荣于及身者，以不孝论。”⁴三是由于嘉兴地区经济发达，很多望族把工商等业与农业一样作为治生的内容，在家训中传承下来。“凡子弟资品上者，教以娴习经史，性资拙钝者只须教以治生之术，如农桑本务、商贾末业，皆可食力资身，总不可游闲废业。”⁵“子弟当务己业，士农工商，对其才能。”⁶嘉兴地区的望族不轻视工商等业，族人通过从事工商，为家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也有利于家族的长期兴盛。

同时，戏子、衙役、兵士等，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辱门楣的贱业。众多望族规定：“一切贱事足以败坏家风者，皆不许为。”⁷

第四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科举盛况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当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后，一个家族科举及第的人数、为官的人数以及为官者官位的大小，成为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族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对族人的教育，提高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朝着入仕为官的方向发展，从而来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因而，以科举入仕为目的的教育成为家族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嘉兴地区的望族对科举的关注，表现为对秉赋聪颖、学习上进的子弟，给予大力支持和重点培养，使得子弟可以安心读书，并顺利参加科举考试。《海盐任氏家塾记》就有这一方面的记载：“聚族之俊秀者于家塾，而以义田之所入为之劝导，所以造就人才者。”⁸

为鼓励族中子弟积极应考，家族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参与科举考试的家族成员给予一定的资助和奖励，海宁许氏⁹对此有相关规定：“凡子孙应试者，每人每次岁科试，各给银两两，录遗给银壹两，其补岁试及科试不录而补遗者，俱不准给。乡试给银贰两，会试给银拾两。”¹⁰以及“好学能文者而窘于应试，公议酌助。”¹¹海宁查氏也说：“岁科前列者，助刻试卷，秋闱艰费者，量助之。”¹²同时，各望族也立下了相关的奖励措施，试举几例。

嘉兴地区望族优奖科举情况表（单位：两）

名目 家族	州府案首	入学	补廪	副榜	中举	入贡	中进士
海宁许氏	1	2	2	4	8		16
嘉兴姚氏		2	2		8	20	10
海宁祝氏		0.5	1		5	2	10

¹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² 《海宁查氏族谱》卷十三《家训》，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³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⁴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⁵ 《干氏宗谱·家训八箴》，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⁶ 《顾氏新谱·遗训》，2004年电脑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⁷ 《徐氏家乘·家训》，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⁸ 《任氏宗谱》卷首上《海盐任氏家塾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⁹ 海宁许氏系伯夷之后，周武王时封于许，子孙遂以为氏。晋代许舛，迁居盐官，是海宁历史最久的望族。

¹⁰ 《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考费》，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¹ 《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贖卹》，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¹² 《海宁查氏族谱》卷十三《家训》，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资料来源：1、《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花红》，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2、《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祠规》，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3、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86 页。

由于对教育的重视，加上嘉兴地区经济的发达，有实力的望族还参与地方教育，资助创办地方官学和书院，并讲学其中。这一方面的记载，就有海宁许氏家族许汝霖和许仁沐就分别在地方上创办了东山书院和双山讲舍。另据民国《海宁州志稿》记载，重修安澜书院时，“州中巨姓若查若陈若朱……或捐田，或捐银，或捐桌椅”¹。这为嘉兴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族中子弟的进一步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科举不仅是人才个体的较量，也是区域文化质量的较量。嘉兴地区，以其较高的文化素质，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嘉兴地区的望族，由于对教育的重视，在科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清代，嘉兴地区的望族在科举上大规模地显示出了自己家族的整体力量。

本文先从清代的“巍科”²人物考察科举与嘉兴地区望族的关系。据潘光旦统计，清代共有巍科人物 520 人（凡中了会元以后，廷试又名列前四名的算作两人），其中嘉兴府 28 人。在这 28 人中，属于嘉兴望族的就有 17 人（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文中，所统计的巍科人物包括嘉兴府境内以及府境外、与嘉兴望族有婚姻关系的人，但海宁地区，潘光旦只把陈氏计算在内，没有统计其他家族）。³本文下表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删选增补而成。

清代望族巍科人物表（包括海宁）

巍科别	姓名	科分	有关的望族
会元	沈昌宇	雍正庚戌	秀水沈氏
会元	周泮	乾隆辛未	嘉善周氏
会元	汪如洋	乾隆庚子	秀水汪氏
会元	钱楷	乾隆己酉	嘉兴钱氏
会元	朱壬林	嘉庆辛未	平湖朱氏
状元	沈廷文	康熙戊辰	秀水沈氏
状元	金德瑛	乾隆丙辰	秀水金氏
状元	汪如洋	见前	见前
状元	朱昌颐	道光丙戌	海盐朱氏
榜眼	查嗣韩	康熙戊辰	海宁查氏
榜眼	陈元龙	康熙乙丑	海宁陈氏
榜眼	沈昌宇	见前	见前
榜眼	沈初	乾隆癸未	平湖沈氏
榜眼	钱豫章	乾隆丁未	嘉兴钱氏
榜眼	钱福昌	道光己丑	平湖钱氏
榜眼	金鹤清	道光乙巳	桐乡金氏
探花	张天植	顺治己丑	秀水张氏
探花	顾悦履	康熙甲戌	海盐顾氏

¹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三·学校上》。

² 所谓巍科人物是指，科举制度下会试的第一人与廷试第一甲的三人和第二甲的第一名，即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传胪。

³ 详见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 年影印本）第 98—103 页。

探花	周泮	见前	见前
探花	陈嗣龙	乾隆己丑	平湖陈氏
传胪	吴涵	康熙壬戌	石门吴氏
传胪	杨中讷	康熙辛未	海宁杨家
传胪	俞兆晟	康熙丙戌	海盐俞家
传胪	钱载	乾隆壬申	嘉兴钱氏
传胪	陆费墀	乾隆丙辰	桐乡陆费氏
传胪	钱楷	见前	见前

资料来源：1、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99—103、107—110页。

2、《海宁查氏族谱》，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3、《顾氏宗谱》，清同治元年，刊本，海盐县博物馆。

4、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第一章《县学 书院 学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盐官镇志编写组编《盐官镇志》第七编《人物》，南京出版社，1993年。

6、钱霆：《嘉兴钱氏人物史略》，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0期，2005年，第11页。

上表的不完全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兴地区明清巍科人物与嘉兴望族的关系。但由于巍科人物毕竟数量有限，尚不能完全体现出嘉兴地区家族在科举方面的盛况。下面再进一步考察进士与嘉兴望族的关系。

有清一代，嘉兴共有进士638人¹，清人段光清在论述浙江科举情况时就指出：“每科中式，惟杭、嘉、湖、宁、绍人最多！”²在嘉兴的进士之中，很多来自于嘉兴地区的各个望族。在这些望族中，世系可考、三代以上考中进士者，即所谓“累世甲科”的科举家族，为数较多。

嘉兴科举家族不完全统计表

家族	及第者	科甲
嘉兴钱氏	钱陈群	康熙辛丑
	钱汝诚	乾隆戊辰
	钱载	乾隆壬申
	钱开仕	乾隆己酉
	钱福祚	乾隆庚戌
	钱世锡	乾隆戊戌
	钱豫章	乾隆丁未
	钱楷	乾隆己酉
	钱仪吉	嘉庆戊辰
	钱宝甫	嘉庆己未
	钱栢	道光庚戌
	钱骏祥	光绪己亥
嘉兴金氏	金德瑛	乾隆丙辰

¹ 详见《重修浙江通志稿·考选》第百六册（浙江图书馆誉录本）表十七《清代历朝进士本省各府属人数统计表》和表十八《清代历朝进士本省各县人数统计表》。

² 转引自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金忠济	乾隆甲戌
	金洁	乾隆丙戌
	金衍照	道光壬辰
	金蓉镜	光绪己丑
海宁陈氏	陈鼐永	顺治乙未
	陈论	顺治辛丑
	陈勳	康熙丙辰
	陈齐永	康熙丙辰
	陈元龙	康熙乙丑
	陈成永	康熙辛未
	陈嵩	康熙癸未
	陈邦彦	康熙癸未
	陈世倌	康熙癸未
	陈世倜	康熙丙戌
	陈世倬	康熙己丑
	陈世侃	康熙癸巳
	陈世仁	康熙乙未
	陈武婴	康熙乙未
	陈邦直	康熙乙未
	陈淦	乾隆戊辰
	陈景星	乾隆戊辰
	陈用敷	乾隆庚辰
	陈观国	乾隆乙未
	陈文枢	乾隆乙未
	陈渼	乾隆甲辰
	陈敬五	嘉庆辛酉
	陈传经	嘉庆戊辰
	陈希敬	道光癸未
	陈乃庚	光绪壬辰
海宁查氏	查培继	顺治己丑
	查嗣韩	康熙戊辰
	查昇	康熙戊辰
	查克建	康熙丁丑
	查嗣璫	康熙庚辰
	查慎行	康熙癸未
	查嗣珣	康熙癸未
	查洪	康熙癸未
	查嗣庭	康熙丙戌
	查云标	康熙壬辰
	查祥	康熙戊戌
	查虞昌	乾隆甲戌
	查莹	乾隆丙戌
	查有筠	嘉庆戊辰

	查文清	光绪丙戌
海宁祝氏	祝文震	顺治壬辰
	祝翼权	康熙癸丑
	祝翼模	康熙辛未
	祝安国	康熙癸未
	祝诒	康熙癸未
	祝寿	康熙辛丑
	祝勲	乾隆丁巳
	祝德麟	乾隆辛丑
	祝万年	乾隆甲辰
海宁杨氏	杨雍建	顺治乙未
	杨中讷	康熙辛未
	杨守知	康熙庚辰
	杨存理	康熙癸未
	杨嗣曾	乾隆癸未
	杨思敬	嘉庆辛未
	杨文保	道光辛丑
海宁许氏	许汝霖	康熙壬戌
	许惟楷	康熙丙戌
	许焯	雍正癸卯
	许道基	雍正庚戌
	许炯	乾隆己未
	许槌	乾隆癸巳
	许楣	乾隆癸巳
海宁王氏	王绍隆	顺治己丑
	王廷献	康熙辛未
	王宗基	光绪壬寅
嘉善郁氏	郁之章	顺治乙丑
	郁鼎钟	道光丙戌
	郁鉉	道光癸丑
嘉善曹氏	曹尔堪	顺治壬辰
	曹 伦	康熙己未
	曹源郊	康熙戊戌
	曹焜嘉	乾隆癸未
	曹衍达	道光癸巳
平湖陆氏	陆之淶	顺治丙戌
	陆棻	康熙丁未
	陆陇其	康熙庚戌
	陆祚蕃	康熙癸丑
	陆翼	康熙甲午
平湖张氏	张枢	顺治戊戌
	张钟秀	雍正甲辰
	张钧	雍正庚戌

海盐顾氏	顾鸣阳	康熙辛未
	顾悦履	康熙甲戌
	顾周	康熙己丑
	顾五达	康熙己丑
	顾涛	嘉庆辛未
	顾椿	道光壬午
海盐俞氏	俞云来	康熙庚戌
	俞兆曾	康熙乙丑
	俞兆晟	康熙丙戌
	俞鸿馨	康熙辛丑
	俞鸿图	康熙壬辰

资料来源：1、《金氏如心堂谱》，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2、《海宁渤海陈氏宗谱》，民国二年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3、《海昌祝氏宗谱》，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4、《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5、《安化王氏宗谱》，清道光三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

6、《枫溪郁氏家乘》，清光绪七年刊本，嘉善县图书馆。

7、《干溪曹氏家集序列》，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8、《当湖陆氏枢密支谱》清康熙年间稿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9、《陆氏元和谱》，清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10、《张氏家乘》，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11、《顾氏宗谱》，清同治元年，刊本，海盐县博物馆。

12、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二十六《选举表中·文科二》。

13、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第一章《县学 书院 学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盐官镇志编写组编《盐官镇志》第七编《人物》，南京出版社，1993年。

15、钱霆：《嘉兴钱氏人物史略》，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0期，2005年，第10—12页。

16、洪永铿、贾文胜、赖燕波：《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以上通过部分望族所取进士情况，可以看出嘉兴地区望族在科举上的巨大成就，如海宁陈家和查家，分别有“一门三宰相，六部五尚书”和“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称。如果将举人和贡生等算上，则声势更为浩大。这种科举优势，尤其是群体优势，为嘉兴望族的传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学文化

家学，即家族中世代相传的学问，它是在知识传授过程中与耳濡目染的熏陶中逐步形成的，并能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一定影响，其内容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各个领域。它作为中国古代家族的较为普遍的群体文化特征，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在嘉兴地区，许多望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家学的传承是非常普遍的。在传统宗法社会，家风和家学是最为家族礼仪所重视的，同时也是家训文化的主要内容。钱穆在论及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的关系时曾说：“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

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弟子，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表现，则成为家学。”¹钱穆的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这之后的家族文化传承。

嘉兴地区家学呈欣欣向荣之貌，有“数百年礼仪世家”²之称的闻湖盛氏，有“世以文学称于吴越间”³的干溪曹氏，有以书画闻名的桐乡冯氏等。而且在上一节所提到的科举家族中，也有众多的望族在其他文化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如海宁查氏与陈氏素以“查诗陈字”而名扬海内。

“查诗”，即指查氏一族中能诗者甚众，据查虞昌选编的《查氏诗钞》一书，选入查氏一族的诗人就有41位，其中以查慎行最为著名，他一生作诗一万多首，诗集有《敬业堂诗集》、《续集》。就查慎行一家来说，其弟查嗣琛、查嗣庭和其妹查惜也善诗，分别著有《查浦诗钞》、《晴川阁诗钞》、《吟香楼诗》，还有其子查克承也著有诗集《授拂斋诗存》。⁴

“陈字”，即指陈氏一门的书法艺术名播四海。纵览其家族，稍有名气的书法家可谓举不胜举。如陈祖夔，善于楷书，刻有《渤海藏真》、《玉烟堂集古法帖》等。陈奕禧，是陈氏家族第一书家，其书法被称为“香泉体”，有《梦墨楼法帖》、《予宁堂法帖》传世。陈邦彦，其杰出的书法艺术深得康熙帝赏识，《康熙字典》中的御制序和《御制圆明园十景诗》都出自他的手笔。⁵

同时，在清代嘉兴的学者中，那些赫赫有名乃至左右一代文风的大师，大都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这也正是嘉兴地区家学兴盛的标志。如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出生于文化世家；学术大师沈曾植生于文宦世家等等。

嘉兴地区家学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望族重视文化教育，“诗礼传家”是嘉兴地区望族的共同愿望。“以读书振其家声”⁶，是这一文化心理的写照。他们积极普及族中子弟的家族文化教育，鼓励他们认真读书。同族中人共学一室，时常交流切磋，十分有利于家学的传承与创新。

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科举成为国家取仕的唯一正途，这种学术和政治的紧密结合，加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理。既然学术可以为入仕铺开道路，那么家学的传承与否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价值取向问题，还与家族利益息息相关。因而，科举制度成为嘉兴地区家学兴盛的又一个原因。

嘉兴地区的望族对家学的促进还表现在他们热衷于私家藏书。嘉兴私家藏书兴起于南宋，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清代进入全盛时期，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嘉兴地区的众多学者，如朱彝尊、查慎行、陈邦彦、陆陇其、沈曾植等均藏书甚丰。此外，还出现了众多藏书世家，有桐乡汪氏、海盐张氏、嘉兴钱氏、海宁吴氏、海宁蒋氏等。此外，传统时期的出版业——私人刻书业在清代嘉兴地区也颇为兴盛，如海宁吴騫刻有《拜经楼丛书》、《海昌丽则》等数十种。⁷嘉兴的私家藏书和刻书文化的兴盛，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研究与文化的繁荣，对家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¹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社，2001年，第263页。

² 《闻湖盛氏家乘·祭规》，清宣统三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³ 《干溪曹氏家集序列·序》，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⁴ 《海宁市教育志》第一章《州（县）学 书院 学塾》。

⁵ 《海宁市教育志》第一章《州（县）学 书院 学塾》。

⁶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⁷ 《嘉兴市文化志》第六编《图书》。

第三章 教育转型过程中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

第一节 家族教育变革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在这过程中,西方的教育思想也随之东渐,为中国教育发展指出了新方向。家族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受到西学的巨大冲击,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变革的历程。因此,近代不仅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的家族及其家族教育大变动的时期,影响家族教育改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

近代封建家族制度到清代前期发展到了顶峰,在农村,特别是南方的农村中,可以说大多数人是生活在家族组织之中的,人们在接受专制政权统治的同时,也接受着族长族权的统治。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致使家族制度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制度随之崩溃。同时,在这过程中,随着西方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涌入,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和婚姻家庭的观念也被介绍到中国。新的家庭观、婚姻观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加速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过程。而伴随着家族经济和思想基础的削弱,家族的凝聚力和家族所具有的教化职能也日渐势微。

二、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是被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是中国家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科举入仕,可以提高一个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使家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振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着重要的联系作用,它上及官方政教,下系士人耕读,促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它的废除,则彻底切断了家族借助教育进入上层社会和维护家族利益的重要途径。为此,家族教育不得不根据社会新的需要而寻求其他出路,开始出现与传统教育相分离的趋势。

三、教育观念的嬗变和新学的推行

19世纪后半期,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引导下,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观逐步动摇,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开始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而创办新式学堂,是清政府推行新学的主体。1861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之后一系列新式学堂得以创办。在学制的确立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科举制的废除,也为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条件。此外,教会学校的兴起,吸引了一批家族中的贫穷子弟。

“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化空间,‘新学’教育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学教育制度下旧式私塾、书院的新文化品格,大大扩展了普通民众的教育机会。”¹可见,新学扩大了不同层次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使教育不再为社会某一阶层所垄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家族教育的功能。而1910年,《改良私塾章程》的颁布,促进了家族教育改革的规范化。

在中国这种教育近代化的大背景下,嘉兴地区的望族也逐步对自身的家族教育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它开始改造族学,兴办新式学堂,积极鼓励和资助其族人学习新学,甚至出国留学。

¹ 郝锦花、王先明:《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文史哲》,2002年第5期。

第二节 嘉兴地区望族对科举制和新学的各种态度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危机的日益深化,以儒学为中心、以科举为目的的传统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各种弊端。而嘉兴地区紧邻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得风气之先。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嘉兴各望族的人们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展开了对以科举制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批判,同时能及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关注和接受新学。

蒋百里曾说,“举科举为例……考生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这种制度不知坑死了多少人。他们就是幸而考取,满头白发出来作了官,这种废物对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用处?……开科取士,又进一步加上八股的桎梏,其害人之深与女子缠足相等。我所见的举人、翰林,他们化成灰也还是奴才坯子。”¹虽然蒋百里对科举制的批判过于激烈,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危机,“八股取士”使士人们沉迷于文字游戏之中,其视野被遮蔽,对近代世界一无所知。

张元济,近代西学的积极提倡者和传播者,他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就认识到了“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²。他指出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废除科举,学习西学,培育大批维新人才,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并且他“以身先之,逢人说法”³。这种认识,对于一个进士出身,官至翰林的士人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在对待西学上,他非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这是“新旧杂陈,两不相容”,因而他提倡“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⁴

此时,即使一般望族中的士人,也开始认识到旧学的弊端,逐渐注重新学,据《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记载,“先叔父济帆公谓锡川,清附贡生……时清政不纲,外患日亟,知旧法之不可以绳墨守,于是命长子斯次子负笈海上,入南洋实业学校,季女志远入务本女校,以期他日储为有用之才。”⁵

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海盐士人张慈生已认识到“旧学之陈腐,不合培育人才之需”⁶,倡议开办新式学堂。

海盐张氏在其宗祠内,辟有图书室,订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之江日报》以及海盐出的小报,供族中子弟浏览阅读。⁷

第三节 嘉兴地区望族的办学活动

近代族学的变化,是新式教育与原有的族学资源互相调和的产物,在顺应时势的调整和重组中,族学逐步趋同于近代新式教育。在开办新式学堂过程中,经费筹措是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望族则有从事族人教育的经济来源。此外,新式师资的缺乏、教学经验的空白等实际困难,势必会利用私学的力量,尽可能地保留、包容旧有教育资源。而且,私塾的学生,经过数次考试,其受教育程度合乎高等小学标准的,也可以进入高一级的新式学校继续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族学和官学的联系,为族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因而,嘉兴地区的一些望族在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族学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新学制和新教学内容的需要。如嘉兴早期的重要学堂——私立慎远小学,就由嘉兴谭氏族学改造而成,于1906年开始招收族外学生。该校聘有教师6人,在校学生90人,是当时招收学生最多的一所学

¹ 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2—93页。

² 《致汪康年 穰卿》,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³ 《致汪康年 穰卿》,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⁴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1页。

⁵ 《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卷之一《十二世济帆公事略》,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⁶ 方南山:《二十年代魏塘镇小学设置概貌》,嘉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03页。

⁷ 柳和城:《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4—195页。

校。¹而在嘉善县,有记载可寻,就有改制的族学3例,如下表:

嘉善县改制的族学事例表

名称	原名	创办人	改制时间
陶园初等小学堂	陶氏义塾		光绪 32 年
私立秉义初等小学堂	程氏义塾	程学洙	宣统 2 年
私立承志小学堂	钱氏义学		宣统 2 年

资料来源:县《教育志》办、文史办:《明清时期嘉善的旧学》,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第5—6页。

同时,庚子以后,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空前严重,日益高涨的政治、经济变革要求,促使许多爱国的中国人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兴学热潮。处于转变期中嘉兴地区的望族,在这股热潮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其家族成员“激于公义”,“慨然以兴学为己任”,“竞相就乡闾创立学堂”。²如宣统元年,董宝楹在董宅率先创办钱山初等小学堂,学生20人,是海宁第一所近代私立小学堂。³

嘉兴谭氏,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谭氏家族素有读诗书通义理的传统,规劝子弟努力读书,正如其家约所言,“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四书经史皆可,以闲其邪心,而兴其善念。读之而成名,固可为佳士;即不能成名,亦须使其粗知义理,而不至入于下流。为父兄者,当加意培植焉。”⁴因而,谭氏家族成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谭新炳,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在家乡提倡新学,创办宗正学塾,在嘉兴开学堂风气之先。在其影响下,谭新嘉于1904年创办了碧漪初等小学堂。⁵谭日森,清末举人,曾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回国后于1907—1909年出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期间,不遗余力地提倡新学。

截至1919年,嘉兴地区的望族独自出资或联合出资创办的有代表性的新式学堂如下表,这种由望族兴办的私立性质的学校,成为嘉兴公立学校的重要补充。

嘉兴地区望族创办的新式学堂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创办人	经费来源
徐氏私立敦本小学	光绪 23 年	桐乡徐氏留婴堂旁	徐棠	徐棠祖母钟太夫人出资二千元
稚川学堂	光绪 28 年	平湖葛氏宗祠	葛嗣渊、葛嗣沆	葛氏义庄赡族余资
诒谷学堂	光绪 30 年	平湖县城隍坊	王铭楹	王氏义庄租息
城观海小学堂	光绪 30 年	海宁张氏支祠	张陞恩、张陞庚	张氏族人捐款
留香学堂	光绪 31 年	平湖张氏留香草堂	张元善	张氏捐资
私立通德两等学堂	光绪 31 年	嘉兴问松坊	郑惟章	
登云初等小学堂	光绪 32 年	海盐	朱丙寿	朱氏义庄
钱山小学堂	宣统元年	海宁董宅	董宝楹	董氏祠款
培风初等小学堂	宣统元年	海盐	徐用福、朱丙寿	
高氏族学	宣统 2 年	嘉兴高氏宗祠	高宝铨	
私立兴武小学	民国 7 年	海盐	朱氏族人	朱瑞遗产

资料来源:1、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四·学校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

¹ 华和一:《谭氏家族与谭家祠堂》,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2辑,1996年,第53页。

²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四·学校下》。

³ 《海宁市教育志》第三章《小学教育》。

⁴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资政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⁵ 华和一:《谭氏家族与谭家祠堂》,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2辑,1996年,第53页。

- 书店, 1993 年影印本。
- 2、民国《平湖县续志》卷一《建置·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 1993 年影印本。
 - 3、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四《教育》,《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本。
 - 4、民国《新塍镇志》卷五《教育》,《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本。
 - 5、宋立宏主编《海盐县教育志》(上)第三章《儒学 书院 学塾》,海盐县教育局, 1990 年。

清末民初,具有家族办学性质的学堂,或由原有族学改制而来,或随新式教育的兴起而创办,主要都是小学堂形式,起到了新学的启蒙作用。在其生源的选择上,和传统族学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除面向本家族成员外,还普遍招收乡里子弟。在经费来源上,除个别学校接受地方捐款外,大部分仍由家族承担,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包括家族原有的族产、义庄收入,族人的捐助等。而在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上,其转变特征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改变传统的经、蒙二段式教育,形成蒙学堂、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等教育形式。如稚川学堂,就分别设立高等教室和初等教室,引进分级式教学¹。其次,课程的设置也有较大变动,增设了许多新的学科。如私立秉义初等小学堂,就增加了算术、常识、体操等课程²。稚川学堂则加设了英文、理化、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科³。第三,教学设施趋于完备。新式学堂一般课堂较为宽敞明亮,拥有先进的实验仪器,以及活动用的操场等。如兴武小学拥有齐全的实验仪器、动植物标本模型,以供实验之用。学校还拥有五亩地的操场,辟有足球场和篮球场。⁴

这一时期,嘉兴望族办学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一些望族开始创办女学。在传统社会,嘉兴地区没有专门的女子教育机构,女子教育大多是在家族内部进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把女子教育列入国家教育之中。然而,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桐乡濮院陆氏家族捐资创办女学,定名为濮院女学社⁵,开了嘉兴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

这一时期,嘉兴地区家族创办的女学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维在县城当弄张宅创办了海盐第一所女校——颉英女学。⁶宣统二年(1910),海宁蒋氏家族在硖石镇蒋家私宅创设振坤女子初等小学堂。⁷1912年,嘉兴徐怀新创办私立怀新女子小学。⁸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近代嘉兴女子学校的发展上,嘉兴地区的望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嘉兴近代史上三位著名的女教育家王琬青、方英、丰瀚,都来自嘉兴地区的望族,她们各自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在其家族成员的支持下,先后创办女子学堂,使更多的女子能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琬青创办道前街女子小学堂。学校设有两个班,王琬青亲自参与教学,讲授修身课。鉴于学校的办学成绩,次年,政府调拨嘉兴、秀水两县的卫生税款银两若干充作该校经费,学校更名为嘉秀女子公立学堂。之后,王琬青为满足嘉兴女子求学

¹ 民国《平湖县续志》卷一《建置·学校》。

² 闵三:《程氏义塾》,嘉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07页。

³ 民国《平湖县续志》卷一《建置·学校》。

⁴ 朱秉均:《兴武小学回忆点滴》,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盐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第78页。

⁵ 陈兴冥:《濮院女学的兴起与嬗变》,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第160页。

⁶ 《海盐县教育志》(上)第五章《小学教育》。

⁷ 《海宁市教育志》第三章《小学教育》。

⁸ 《王店镇志》第六篇《文卫》。

的需要,对学校进行了扩建。民国后,学校改名县立女子高等初等小学。

1912年,方英在其族人方锡川、方於笥等支持下,创办嘉兴女子师范学堂。女师的课程设置,除政府规定的必修课外,还开设刺绣、缝纫两门工艺课,校长方英亲自授艺。1919年,省视学视察学校后,曾称:各科教授透彻详明……该校办理完善,校长方英学行素优,人极厚重,办学数年颇能牺牲一切,尽粹职务。¹

在嘉兴众多女校中,石门振华女校办学成就较为显著。1912年,丰灏在其姊妹丰满的支持下,在丰氏老屋淳德堂创办了该校。学校起初开设两个班级,招收学生数十人。后由于要求入学的女子增多,学校迁至该镇大井头,即现丰子恺缘缘堂旁,并扩充校舍和教员。学校拥有大操场、三层的教学楼等良好的教学设施。

近代,嘉兴的女子学校基本上是私立的,由当地热心办学的人士所倡导,在这之中,嘉兴地区望族是其中的主力军。女子学校的兴起,成为嘉兴地区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女子接受新式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嘉兴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嘉兴地区众多望族的参与。在兴学的浪潮中,嘉兴的望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宣传新学,除出资创办新式学堂外,还捐款、捐地资助嘉兴地区公立学堂的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乌青镇中西学堂改名为青镇高等小学,在此过程中,桐乡胡郑两氏“助隙地,辟治操场一区,建筑讲堂四处”²。1913年,嘉善范氏捐助城立善善、益善两所女校学田163亩6分2厘,折洋3336元。³在海宁,张正民为发展家乡农业,捐巨资购地筑圃,创办“崇正讲舍”,教授农业科技和时务课。⁴而且嘉兴众多的公立学堂,其组织、创办人也都来自嘉兴的这些望族。如来自海宁陈氏家族的陈其谦,就曾参与创办了海宁州达材小学堂等5所公立学堂。⁵此外,褚辅成、陆祖毅、王国华、陈其谦、查人伊、查人伟、许清澄等嘉兴望族中的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还在新式学堂担任教员,亲自参与教学。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袁世凯颁布“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⁶的教育宗旨时,在嘉兴,这些望族兴学人士坚持新学,反对复旧,这对嘉兴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四节 嘉兴地区望族在转向新式教育后取得的成就

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过程中,哪些家族开明,哪些家族能更好地适应学制的变化,那么,这些家族就能继续在文化上保持领先地位。以嘉兴方氏⁷为例,光绪以后,方氏顺应时势的变化,在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上开始转向新式教育,几百年积累下来尚学的家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方氏在转向新学后也很快就硕果累累,这些成绩在第十三世、第十四世这两代上充分展现出来。据《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记载,这两代人中有22人获得了新式中等学堂以上学历,专业也多种多样,有医学、工科、法政、英文、艺术等,其中又有2人分赴日本、美国留学。在第十二世到第十四世中,有4人先后担任浙江地区中学校长,还有2人担任了中学教员,成为清末民初嘉兴地区著名的教育家族。这充分显示了家族整体的文化素质,也反映了嘉兴望族对新式教育的适应和接受能力。

¹ 转引自《嘉兴市教育志》第十四章《专记》。

² 《乌青镇志》卷二十四《教育》。

³ 戴之庠:《民国初期嘉善之教育》,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第13页。

⁴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三一《人物志·张正民传》。

⁵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四·学校下》。

⁶ 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⁷ 嘉兴方氏,明季,思祥公由安徽歙县罗田村避乱迁禾。

清末民初嘉兴方氏进入新式学堂情况（男性成员）

世系	姓名	毕业学校
第十二世	方锡彝	嘉兴府师范
	方锡同	嘉兴师范讲习所
第十三世	方於笥	上海中西书院
	方於裕	上海中西书院
	方於屏	杭州渡边医学堂
	方於杠	嘉兴县立学堂
	方於浙	上海南洋公学
	方於监	东京庆应大学
	方於斗	浙江渡边医学校
	方於楠	美国密内沙太大学
	方於中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方於鸿	杭州官立法政学校
第十四世	方朝樑	浙江大学
	方朝棠	上海文生高等学堂
	方朝元	嘉兴中学
	方朝弼	嘉兴德心医院
	方朝宗	浙江第二中学
	方朝纲	邮电专门学校
	方朝阳	上海光华大学
	方朝钧	杭州医科大学
	方朝熙	邮电专门学校
	方朝良	浙江大学
	方朝彰	浙江省立第二中学
	方朝聘	上海税务学校

资料来源：《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在向新式教育的转型过程中，嘉兴地区的望族教育仍然和传统教育时期一样，得到了家族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其中主要是经费上的支持。家族子弟不仅可以在本族所办的学堂中就读，如外出求学，还可以得到家族一定的补助和奖励。“议定入初等小学者，每年补助钱二千文；入高等小学者，每年补助钱八千文；入中学堂者，每年补助钱十六千文；入高等学堂既专门学堂者，每年补助钱廿四千文；如有出洋留学者，每年补助钱五十千文以上。”¹在近代社会，教育开始走向社会化，新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已开始超出家族教育的能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奖励资助，不仅保证了本族子弟能顺利完成基础教育，还能进一步完成更高的学业。近代，嘉兴地区的望族在其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家族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人才。

近代嘉兴地区的望族新型人才表

家族	代表人物	生卒年	教育	主要成就
嘉兴陆氏	陆祖毅	1874—1944	幼承母教 光绪十六年秀才	嘉兴图书馆馆长 嘉兴教育会会长

¹ 《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四《家范》，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陆志鸿	1897—1973	家塾 浙江省立二中 东京帝国大学	一生从事工程材料学的研究与教学
	陆初觉	1890—1945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入同盟会，组织抗日
嘉兴盛氏	盛庆琳	1861—1935	附贡	北京崇文门警察分署署长，长春市警察署署长，热心地方公益事务
嘉兴师桥沈氏	沈钧儒	1875—1963	3岁由母亲课读 5岁入家塾 光绪三十年进士 东京私立法政大学	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嘉兴荒畴沈氏	沈曾植	1850—1922	光绪六年进士	著名书法家，曾赴日考察教育制度，主张变法，支持维新活动
嘉兴金氏	金兆蕃	1867—1938	光绪五年举人	北京政府财政部司长，参与编修《浙江通志》
	金问洙	1891—1964	天津北洋大学	精通理工，从事高校教育事业
	金问淇	1899—1968	上海同济医学院 德国哥丁根大学 佛莱堡大学	妇产科专家，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手术总队
嘉兴褚氏	褚辅成	1873—1948	秀才 幼年在家从兄读书 日本警察学校	嘉兴同盟会领导人，开办新式学堂，倡导女子教育
	褚凤章	1896—1951	烟台海军学校 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 硕士	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创办嘉兴商报 一生致力于造纸事业
	褚风仪	1898—1975	早年去法、德两国留学	上海法学院教授，院长
嘉兴方氏	方於笥	1977—1945	上海中西书院	同盟会、光复会成员，浙江省立第一、第二中学校长
	方英	1878—1939	上海务本女学堂	创办嘉兴女子师范学校
嘉兴钱氏	钱宝琮	1892—1974	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开辟了中国数学史、天文史的研究
嘉兴姚氏	姚慕莲	1878—1950		历任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衡通钱庄董氏、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等职
嘉兴潘氏	潘琪	1892—1952	嘉兴省立第二中学	画家，曾在嘉兴从事教育工作
嘉兴龚氏	龚未生	1886—1922	日本清华、振武两校	嘉兴辛亥革命七烈士之一

嘉兴顾氏	顾作人	1900—1977	上海南洋中学	国民党嘉兴县的主要负责人
	顾烈之	1906—1939	黄埔军校洛阳分校	组织抗日地方武装部队
嘉兴陶氏	陶葆廉	1862—1938	贡生	代理浙江大学堂总理，热心嘉兴地方公益事业
嘉兴蒋氏	蒋志新	1880—1960	肄业日本大阪工专、长崎医科大学	入同盟会，任浙军军医创办德心医院，后设立德心医学及助产两校，培植地方医务人员
嘉兴郑氏	郑兰华	1895—1971	从小由父母教读 上海华童公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 美国芝加哥大学	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
嘉兴黄氏	黄子通	1887—1979	秀才 上海交通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经济 加拿大托朗托大学学哲学	从事大学教育和哲学史研究
嘉兴陈氏	陈世骧	1905—1988	上海复旦大学 赴法留学	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嘉兴戴氏	戴补斋	1864—1931		创办干窑北市小学堂，筹办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
嘉善张氏	张天方	1887—1966	秀才 上海震旦学院	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嘉善第一份报纸《善报》
嘉善钱氏	钱能训	1870—1924	光绪二十四年进士	曾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顾问，组织中华懋业银行
平湖胡氏	胡士莹	1901—1979	幼承家学 浙江省立第二中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平湖葛氏	葛嗣澎	1867—1937		光绪二十八年，以义庄田产贍族余资于葛家宗祠设立稚川学堂，后改为稚川两等小学堂。民国13年8月，又创办稚川初中
平湖陆氏	陆惟钊	1899—1982	幼承家学 南京高等师范文史部	著名书画艺术家，从事教育事业
海盐张氏	张元济	1837—1959	光绪十八年进士 光绪二十一年，习英文	总理衙门任章京，主张变法，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
海盐朱氏	朱瑞	1883—1916	南洋陆师学堂	入光复会、同盟会，浙江都督

海盐朱氏	朱希祖	1879—1944	秀才 日本早稻田大学	文史大家，从事教育事业
海宁吴氏	吴世昌	1908—1986	燕京大学	著名红学家，参加爱国抗日活动，从事教育工作
海宁钱氏	钱崇澍	1883—1965	秀才 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后赴伊利诺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学家，开辟中国植物学研究
	钱崇润	1886—1927	日本帝国大学	创立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兼任校长，并任教
海宁查氏	查人伟	1887—1949	秀才 法政学堂	革命人士
	查良钊	1897—1982	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从事教育事业
	查猛济	1902—1966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任《新浙江报》主编，积极鼓吹新思想
	穆旦	1918—1977	西南联大	现代杰出诗人
海宁居氏	居天籛	1906—1989		中共海宁县硖石支部书记
海宁周氏	周承莢	1883—?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入同盟会，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军委高级顾问
海宁蒋氏	蒋百里	1882—1938	族学 杭州求是书院 日本成城学校	近代著名军事家，曾主编《浙江潮》，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蒋复璁	1898—1900	北京大学 柏林大学	图书馆学家，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海宁顾氏	顾贻穀	1885—1944	秀才 京师大学堂	中央银行业务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 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董事
海宁徐氏	徐志摩	1897—1931	家塾 硖石开智学堂 杭州府中学堂 北京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	诗人，创办《现代评论》，担任《晨报主编》，从事教育事业
海宁许氏	许姬传	1900—1990	幼受家学熏陶	京剧研究家

海宁张氏	张宗祥	1882—1965	举人	从事教育事业，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
海宁王氏	王国维	1877—1927	入塾 父亲课读 日本东京物理学校	近代著名学者
	王国华	1886—1980	上海圣约翰大学	热心家乡教育事业，长期从事英语教学
	王敬五	1880—1968		创办华丰面粉厂，在家乡创办怀中小学，从事教育事业
海宁朱氏	朱宗莱	1881—1919	日本早稻田大学	入同盟会，组织海宁州图书馆、教育会
海宁朱氏	朱起凤	1874—1948	廪生	入同盟会，硖石图书馆馆长，著有《辞通》
桐乡陆费氏	陆费逵	1886—1941	由母亲教读	主持中华书局
桐乡丰氏	丰子恺	1898—1975	家塾 崇德县立高等小学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漫画家
桐乡沈氏	茅盾	1895—1981	幼受父母教育熏陶 立志小学 嘉兴省立第二中学	著名文学家
	沈泽民	1900—1933	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宣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
桐乡徐氏	徐自华	1873—1935		入同盟会，浔溪女校校长
	徐蕴华	1884—1962	受学其姐 浔溪女校 上海女校	入同盟会，崇德女校校长
桐乡卢氏	卢学溥	1877—1956	光绪二十八年举人	任国民初等男学堂堂长，主持浙江实业银行
桐乡严氏	严独鹤	1889—1968	秀才 兵工学校 广方言馆	著名报人、小说家

资料来源：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第四十六篇《民族 宗教 妇女 氏族》，第四十八篇《人物传记》，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第五节 清末民初嘉兴地区望族新旧家族教育并存的情况

在清末民初的兴学热潮中，嘉兴地区的部分望族通过改造原有族学或开办新式学堂，开始把新学教育引入家族教育中，并鼓励和资助其族人接受新学教育。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光绪三年（1877），出生于海宁一个习儒经商的家庭。但追溯其家世，王国维有一个显赫的先祖，这就是经历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以后被追谥为

“忠壮”的王稟。王国维所属的一支,“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¹,但仍不辍诗书,出过不少读书人。因而,王国维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以诗礼传家的家族中,从他出生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为止,都是在海宁这个充满士大夫文化氛围的书香之家度过。他从最初接受传统教育,到向往新学,放弃科举,这与他所受良好的家族教育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1847—1906),出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从小既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王乃誉为谋生而经商,同时又不废书史,在从小接受家族启蒙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地学习,书画、篆刻、诗词、古文等均有涉猎,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王乃誉广泛接触新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两年,提出了去旧维新的要求,这虽然离不开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法图强的氛围影响,但又从中反映了王乃誉思想的开放性。光绪二十二年(1896),“夜,二三次看陈虬所著《经世议》。余谓中国不议更张则已,若欲驾东西洋自立,非由皇上至合朝悉心竭力,去旧维新……”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国维从小受到了多元文化的熏陶。王乃誉对王国维的影响,是其接受传统教育到选择新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父的治学之道,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时期的王国维。

光绪九年(1883),七岁的王国维业师潘紫贵,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十三年(1887),王国维又业师陈寿田。同年正月,王国维的祖父去世,父亲王乃誉归家,居丧不出,除了有时还过问些商贸事务外,主要是读书、品书、写笔记,特别是对王国维的教育,成为其心中的大事。从这一年开始,王国维的学习生活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在塾师处受教外,还受到其父严格的教育,常常是白天上学塾读书,晚上受父亲的指导学习。其弟王国华追忆少年往事说,“丁亥,先大父嗣铎公弃养,先君遂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发行篋书,口授指划,每深夜不辍。时先兄才十一(岁)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涌。”³王氏父子俩还会随意切磋诗文,商讨生计。如读书与经商,前者属于仕途,后者属于营生,他问长子何者为好,以便就其所长作出选择。他还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谈论“为人处世之方”,⁴教导长子应该怎样处理人事关系。王乃誉的教育,把写字、作文、养性、处世都结合在一起。他的一则日记就记述了这方面的内容:“伯氏又送挽诗来请,遂属静踵成之,并兼书楷焉。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鹵莽。即此小事,亦犹磨镜然,极至精光,落笔何难耶?”⁵

王乃誉自己治学未受科举考试的影响,也不希望王国维的学业只限于举子业的功课范围。王国维酷爱课外阅读,大致亦由此开始。他自述,“家有书五六篋……晚自塾归,每泛览焉。”⁶除了祖传之书,王乃誉也搜罗了一批书籍,其中有不少是经史之外的金石书画方面的著述,这更使王国维开拓了文化视野,丰富了阅读内容。光绪十九年(1893),王国维参加科考,但是不终场而归,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随着读书范围的扩大,王国维知识面愈开阔,其求知欲望也愈强烈,不愿被举子业所束缚。正当王国维在举子业和读书志趣的矛盾中求索时,及时给他帮助和鼓舞的正是他的父亲。此时,中国的知识界兴起了提倡新学的思潮。王乃誉关心新学,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抄《申报》中总理同文馆课程、《翻译书目》,实当今时务之急也。”⁷他手录这些课程和书目,为的就是指导王国维等儿辈学习新学、新政。康梁的公车上书,更引起了王乃誉的极大关注。王国华回忆说:“中日之战,变政议起,先君子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之学而不为。”⁸这表明,王乃誉十分赞赏康、梁的变法主张,并要王国维认真阅读。这更激起了王国维对新学的强烈渴望。新学新政成了王氏父子的共同兴趣,时常互相传阅有关读物,谈论感受,“静持《时务报》第一、第三册(归

¹ 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姚淦铭编校《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² 转引自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9页。

³ 王哲安:《序三》,《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本。

⁴ 转引自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⁵ 转引自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⁶ 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⁷ 转引自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⁸ 王哲安:《序三》,《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本。

家),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穉卿,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恰时政,诚此时之要务。惟变谈何容易,杞忧之。况籍措薪,疾首而大人君子未必听,必至万不可为,大事已去,乃思一死,此所以习固结,大愚不灵”¹,这足可见王国维家庭当时崇尚新学的文化氛围。二十多年后,王国维在王乃誉去世时所写的《先太学君行状》中感慨其父得风气之先:“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之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而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貌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²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外出求学的愿望更加强烈,王乃誉力图促成。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乃誉为王国维求学一事致函家欣叔,并请代为推荐学堂时,说王国维“于外洋之政略能涉猎”,原信如下:“……蠖伏茅塞,材成樗蒚,精神颓蔽,日惟以弄笔遮书,尚何足言。惟大儿年已及冠,而文字尚有可观。当此中外政事改睹,而渠于外洋之政略能涉猎,思得一谋学生地,以莫其成立。叔族□□□□善奖成后进、况子姓有□□自能水惜齿芬□云陆师学堂得成亦妙,否或为出洋学生。此儿学事务实,无□习外好之弊。现成在乡,无可表见,□无所遇,而为童子师,是非吾叔则望之段。务求玉成一地,是在叔之汲引之思也……”³这反映了王氏父子已经认识到要有所成就,最好的出路是进新式学堂学习,或出洋留学。虽然此次写信推荐无果,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国维再次参加了科考,但也正是这次考试,使王国维真正下定决心放弃科举,王乃誉也希望儿子能“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⁴。于是在次年正月,王国维在其父的陪同下,离开海宁,前往上海。

可见,在王国维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其父的教育对他影响很深。其弟也认为,“综先兄一生……其有承于先君子尤众”。⁵

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所受的家族教育还是带有传统教育的影响,那么晚其二十年出生的茅盾,则不折不扣地接受了新式的教育。

桐乡沈氏,是当地一个半官半商的大家族,茅盾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中。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一位秀才,但当维新思潮波及乌镇之后,沈永锡便成了维新派中的一员。他开始关注新学,时常“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⁶。茅盾的父亲较早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追求维新思想,重视新学。而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出身书香门第,是位有才干、有见识的女子。六七岁时,就进入亲戚家的族学里接受启蒙教育。出嫁后,受丈夫的影响,喜欢读书看报,对时事政局颇有见解。茅盾生活在这样一个比较开通的家庭里,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家族教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得比较早,5岁开始,便由其母亲亲自教读。茅盾的父亲沈永锡选取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之类的新书,以及一本用浅近的文言编成的《史鉴节要》,作为茅盾的启蒙读物。七岁那年,茅盾进入家塾,由其父亲亲自教其新学。之后由于父亲生病,茅盾便转入了亲戚家办的族塾。当光绪三十年(1904),乌镇开办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时,八岁的茅盾就进入该校学习。

茅盾的这种家族教育,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了新学,受到了开明思想的熏陶。茅盾的父亲即使病倒之后,还天天与他谈论国家大事,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强国的历史,常常勉励茅盾要以天下为己任。茅盾在《我的小学时代》回忆说:“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

¹ 转引自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² 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姚淦铭编校《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³ 转引自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⁴ 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⁵ 王哲安:《序三》,《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本。

⁶ 茅盾:《我的家庭与亲人》,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本来整理。有十几本《新民丛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先生。”¹

茅盾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担当起教育的重任，在教育培养子女上，既严格又慈爱。茅盾是她的长子，沈泽民是其次子，因而她时常告诫茅盾长兄为父，要为弟弟做一个好的榜样。陈爱珠不仅教育两个儿子要奋发学习，而且常读上海新出的杂志报纸。与两个儿子议论国家大事，谈论民族前途，谈论他们父亲的抱负和宏愿，激励教育两个儿子成才，积极送两兄弟外出求学。

茅盾家族中这种新式的教育，使他和他弟从小接受新学的熏陶，为他们的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之后，茅盾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其弟沈泽民则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

这两个个案，虽然不能反映近代嘉兴地区家族教育的全貌，但对其从传统向近代的变迁，也能略窥一二。

但与此同时，大多数的望族认为要学习西学，必须打好中学的基础，对传统教育仍旧十分重视，因而传统的家族教育在嘉兴地区不少的望族中还继续存在。试举几例：

郑兰华（1895—1971），著名化学科学家、化学教育家。父郑之章，为地方知名学者。从小由父母教读四书五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直接考入上海华童公学。

陆志鸿（1897—1973），从小在家塾念书，由父亲授读诗书，代替小学教育，直接升入浙江省立二中初中部。

徐志摩（1897—1931），四岁入家塾开蒙，业师秀才孙荫轩先生，一年后开始跟着查桐轸先生习古文。这种家塾读书生活一直持续到徐志摩 12 岁时，才进了海宁开智学堂读书。但也正是这种严格的旧式教育，为他日后成为中西兼通的现代知识分子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

丰子恺（1898—1975），六岁入家塾读书，接收启蒙教育，读《三字经》、《千家诗》等。

苏元复（1910—1991），中科院院士，出生于书香门第。苏氏家族注重对族人的教育，在其子弟上小学的同时，还聘请塾师在家教授古文和书法。苏元复在成年后回忆，私塾生活“培养了忍耐性和埋头苦干的精神”。²

可见，清末民初的嘉兴望族家族教育，是一种新旧并存的情况。在新的教育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各望族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教育思想，并适时把它引入到家族教育中，但是传统的家族教育内容、方式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继续存在。虽然在这之后，这种新旧教育并存的情况在嘉兴望族的家族教育中还将继续存在，但它毕竟开始了嘉兴望族家族教育的近代化之路。

¹ 茅盾：《我的小学时代》，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0 页。

² 转引自沈云汉：《为科技奋斗终生——中科院院士化工专家苏元复教授》，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宁人物资料》第 8 辑，1997 年，第 89 页。

第四章 传统家族教育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的影响

第一节 教育观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支配着教育,并规范着教育观念的变迁,家族教育也不可避免受其影响。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传统家族教育逐渐衍化成为为科举服务的教育。而近代家族教育则是随着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东渐,在整个中国教育变革的影响下形成的,逐渐摆脱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由于传统家族教育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教育观具有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思想。科举考试是以儒家思想为归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纲常。因此,传统家族教育就是依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以伦理纲常为宗旨,旨在敦人伦、崇礼仪、重三纲、尊五常,培养修身养性的君子。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是以西方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注重培养满足近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独立自由人格和自由竞争精神的人才。

第二,教育形式。传统家族教育以家训文化为其规范,以族学为主要形式,传承家族文化。近代新式教育则采用了西方移植而来的学校制度,将新式学堂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场所。传统家族教育一般为蒙学,只有一些有经济文化实力的大族采用经、蒙二段式教育。近代新式家族教育开始也为蒙学的性质,所改制或设立的新式学校主要是小学堂¹,但在这些小学堂中,很多引进了分级式教学。如稚川学堂、私立通德两等学堂,在教学中就针对学生的教育程度,分为初等和高等两种形式。之后随着教育变革的深入,中学堂随之创办,如私立愚移中学²、稚川初中³、私立有怀中学⁴就分别由嘉兴的望族出资兴办。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嘉兴望族新式的家族教育,在要求本族子弟进入家族所办的学堂外,更积极鼓励他们外出求学,此时族人受教育的程度已经发展到了职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有的甚至还出国留学。

第三,教育内容。传统家族教育一般从最基本的读书识字开始,以儒家经典为内容。据民国《海宁州志稿》记载,课本主要有《周易》、《书经》、《诗经》、《春秋》、《朱子纲目》、《十三经注疏》、《孝经行义》等。⁵这种教育,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忽视。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则以新学为主,旧学为辅,一改过去儒学独尊的地位。在课程的设置上,近代教育最显著的变化是引进了格致之学和随意科(手工、图画、音乐等),改变了传统家族教育注重道德伦理和学习经典知识的局面,开始重视全面教育、注重人的和谐发展以及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使科学在近代教育中找到了立足点。如家族办学中教学活动颇具特色的私立兴武小学,分设六个年级。低中年级的国语课选用商务版文言读本,高年级选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英语课从三年级起读《英文津逮》。注重珠算、书法、美术教学,自然课重视实验演示。体育课注重体操、队形训练和足球运动,课外文体活动颇为活跃。⁶其他如留香学堂,“授经史珠算,旋加格致、体操两课”,稚川学堂,“课以经史珠算,加课英文、理化、手工、图书、音乐、体操各科”。⁷私立怀新女子小学,该校设科完整,有语文、算术、英语、地理、历史、音乐、劳作、编织等课程。⁸

第四,教育的目的。传统家族教育的目的具有两级性,维护家族伦理与科举入仕。科举

¹ 参见本文第三章第三节《嘉兴地区望族创办的新式学堂表》。

² 民国10年,朱苍宇创办。

³ 民国12年,葛嗣汾创办。

⁴ 民国19年,王敬五创办。

⁵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建置志三·学校上》。

⁶ 宋立宏:《兴武小学》,海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盐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1年,第7页。

⁷ 民国《平湖县续志》卷一《建置·学校》。

⁸ 《王店镇志》第六篇《文卫》。

制度以官为本位,强调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使传统家族教育在普及族人文化知识的基礎上,十分重视入仕教育,达到了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并教化族人,维护家族秩序,促进家族的振兴和发展的目的。西学的广泛传播和新式教育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并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使近代教育摆脱了科举制度附庸的地位,走向独立,也使人们摒弃传统读书做官的思想,开始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教育对象,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促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佳的社会位置,并培养其社会主体意识和国民精神。受其影响,新式家族教育虽然一开始也只是从维护本家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培养新式人才,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嘉兴地区的家族重视教育不再仅仅关注个人求取功名和家族发展,而是逐渐认识到了教育与救国的关系,以及对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兴贤育才识于周礼,古今中外凡国家兴亡治乱,民族强弱盛衰,莫不视人才学术之消长进退为衡”¹。

第二节 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嘉兴地区望族开展家族教育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作用,是维护本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为家族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支持。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传统家族教育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则给家族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巩固和团结,增强了家族凝聚力。传统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族人开展基本的读书识字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这与科举思想是并行不悖的。家族源于同一个祖先,家族教育总是极力宣扬这一特质,强调了同宗共祖,一脉相承的同源意识,给族人灌输了以家为核心的思想。首先,家族提倡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认为“和宗睦族之道必始于孝弟”²,“忠厚信行一身之大本”³,提倡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强调家族内部上下的尊卑伦序,树立家长、族长的权威,巩固家族制度,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其次,劝告人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强化族人群体意识。要求族人“提携孤弱,周恤饥寒”⁴,设立义学,重视族中贫寒子弟的培养和造就。这些措施有效地融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矛盾,保证族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促使家族亲情和家族力量的凝聚。同时,嘉兴望族普遍开展文化教育,认为读书能够“明理”,“知礼义廉耻”⁵,盼望子孙读书知礼,养成良好的品德,更能保家益族,维护宗族秩序的稳定。

然而,到了近代,教育开始走向社会化,新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已不是一个家族所能承担的了。家族成员如不能在新式的学堂中接受全新的知识,家族也就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嘉兴地区望族积极参与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鼓励其族中子弟学习以西方科学文化为中心的新学,促使家族中先进分子走出家族、步入新式学堂成为普遍现象。嘉兴望族这种新的教育观念,是家族面对社会变迁所作出的适应性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从家族利益出发,培养显扬家族荣誉的族人,使家族在新的社会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的優勢。但是在客观上,这种新的教育观念,开始影响了嘉兴近代的望族。

通过接受新式教育,嘉兴望族中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明,开始了思想观念的转变,逐步突破了家——族的思维模式,开始批判尊卑长幼的纲常伦理,逐渐走上了与传统家族文化相背离的道路。尽管大多数望族中第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从思想观念上彻底否定家族制度,但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社会制度、自由平等民主原则,而开始对家族制度持怀疑态度。随着新学的进一步深入传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家族制度的叛逆者。如沙可夫,原名陈维敏,海宁人,在其童年时期,接受着祖辈书香门第的传统教育,长辈教他读诗书、学礼仪,希望他读书求仕,光耀门庭,而他却从读书中得到了文化知识的启蒙。民主思潮的

¹ 《乌青镇志》卷二十四《教育》。

² 《干氏宗谱·家训八箴》,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³ 《嘉兴谭氏家谱》卷之二《谦后公家约四则》,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⁴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⁵ 《嘉兴竹林庙高氏谱·家训十条》,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影响,使他逐渐从继承祖业和做官当老爷的道路上反其道而行之,开始走上了背叛家族、投向革命的道路。

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嘉兴望族中的士人开始转化为近代新知识分子,他们再也不可能通过士人→科举入仕→士绅的转变而重新回到家族中去,这些近代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被早期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所吸纳,其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愿意回到封建伦理控制的家族社会中去。传统士绅是家族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士绅的转变和从家族社会中的流失,家族社会传统的政治领导阶层——士绅阶层出现了断层,传统家族制度开始走向没落,这也预示着乡村家族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由于族人与家族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近代思想文化主流也通过家族中的新知识分子而深入家族,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冲击家族血缘伦理观念与血缘伦理关系,家族内部以父子关系为中心,以孝和服从为基本准则的血缘伦理关系逐步削弱,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瓦解,家族社会开始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罗兹曼就认为科举制度“取消‘士’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组成部分,势必加速了社会关系的解体。各地方政府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体化开始衰落,它削弱了家庭、血缘亲族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主义。”¹

但是,尽管嘉兴的望族所提倡的新学教育,给家族社会带来了上述种种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只是一种微风细雨式的渐变,在当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导致家族社会的变迁。

第三节 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除对家族自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无论在传统还是近代社会,家族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传统和近代新式家族教育两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本文第一章已详细论述了传统家族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它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女子教育的重要载体。嘉兴地区望族的这种家族教育是面向全体族人的,提高了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它的助学功能,为贫困族人子弟增加了学习的机会,使得族中子弟不论贫富都可以受到教育,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教育的不足,促进了该地区教育的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嘉兴地区望族重视教育,形成了德教为先、注重人格培养、注重不断学习、注重早期教育等许多良好的教育传统,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而在近代,嘉兴地区望族的这种教育,传播了新的教育思想,鼓励和资助了族中子弟外出求学,更重要的是由嘉兴的望族自身或来自望族中的进步士绅开办的新式学堂,是当时嘉兴近代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为嘉兴乃至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产生于嘉兴望族中的一批留学生,回国后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坚分子。他们中有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教育思想家王国维、历史教育家朱希祖、美术教育家丰子恺、诗人兼教授徐志摩等。现择其一二介绍之。

蒋百里,我国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他先后几次主持军官学校,积极革除弊端,悉心培养中国军事人才。他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注意调查考察。他主张加强军人的品格教育,要求学生精神与学业并举,其教育方法是启发军人的爱国心和自尊心。同时,他认为军官学校首要任务是学好军事理论,把书本和实践相结合。

王国维则是近代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教育的主张,对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进西方教育。王国维在1901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先后从日文书和西文书中翻译了二十多部急需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有《教育学》、《算学条目及教授法》、《心理学

¹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9页。

概论》、《叔本华之遗传学》、《法兰西之教育》等等，这些译作，在社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期间，他还曾担任《教育世界》杂志的主编，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西学，使国人对西方教育有一定的了解，也为我国创建新式教育提出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

第二，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并举。1903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美育一词。他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对于智育，他力主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并重，不可偏废；对于德育，他认为是教育的根本；对于美育，他认为可以使人精神高尚，忘掉个人私利，应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在当时来说是较为先进的。

第三，重视师资的培养。王国维对于兴办学校，首先着眼于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他力主办好高等教育，以充实中学的师资；办好中等及师范教育，以充实小学的师资。他早在1897年底就已开始谋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但此议受阻未能实现。后来他曾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执教，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师范教育。

此外，王国维对开展教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行政理论的研究也十分重视。

可见，许多来自嘉兴地区望族的教育者，其对近代教育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了嘉兴一地的范围，已深刻影响到了整个中国。

其次，传统家族教育和近代家族教育，也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在很多方面对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人才的培养

在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读书与科举入仕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家族为自身发展的需要，热衷于开展教育，把人才作为家族振兴的根本所在，竭其所能，培育英才，帮助族中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以便不断扩大族产，提高社会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嘉兴的望族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其子弟正是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步入仕途，有些人还因此入阁拜相，其科举盛况，本文已在第二章中有了详细论述。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被称为“簪缨世家”的海宁陈氏家族，明清两代，就中进士者31人，乡试中举人者107人，为官者共192人，位居高官大学士、尚书、侍郎等的有14人。其中从顺治九年（1652）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一百余年间，就有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三人通过科举及第，先后成为大学士。

同时，嘉兴的望族家学的传承，还培养了大批儒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人才。

而在近代，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中国传统的人才观开始发生转变。在嘉兴地区，由嘉兴的望族自身或来自望族中的进步士绅开办的新式学堂，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新式学堂一样，在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学目的、教学形式等方面与传统的学堂有很大差异。家族教育的一系列变革，改变了过去为科举服务的目的，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新的人才观与传统儒家强调科举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同，要求培养和选拔军事、科学技术等的专门人才，以应对时局的挑战。另一方面，人才的知识结构也趋向多元，从而突破了传统经学人才的樊篱。因而，嘉兴望族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改革原有的教育观念，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从而达到了教育启蒙和普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作用，为近代社会培养了所需的人才，促进了近代嘉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第二章新型社会人才的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嘉兴地区家族中的先进分子主要在教育、军事行政、实业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

而这种近代新式人才的出现，进一步促使人们用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去看问题，去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进步。

二、对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与冲击

中国地域辽阔，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和军事力量很难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统治者都很重视家族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重要作用。

家族组织的普遍存在，是专制政权赖以支撑、封建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一种广泛的社会

需要。他们在封建统治权力难以延伸的州县以下主要利用家族来维系人心,家族因此成为封建政权与广大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时,儒家文化是传统社会家族组织内部一整套观念制度的直接来源,修身、孝悌、尊卑、睦族等家族观念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于家族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生在家族组织的祭祀、修谱、教化族人等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对族人的言行举止起到了规范和监督的作用。因而,家族组织可以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家族对其族人的教化,在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反映为对儒家正统思想、纲常伦理的维护。

对嘉兴地区的望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本文在第二章家训文化一节中已有详细论述。可见,家族教育保证了家族成为协助基层政权维护秩序的有力工具,也为维持家长式专制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忠顺臣民,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近代,新式学堂是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嘉兴望族鼓励族人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在新式学堂中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的青年人,对社会的前途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以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为己任,迫切要求变革社会。留学生更是传播西学的主力军,他们翻译西方书籍,创办多种刊物,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民权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蒋百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主编《浙江潮》,积极宣传革命。

在接受了新学教育以后,嘉兴望族中甚至有不少人士在由旧式的士子士人转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成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者,打击了封建的统治秩序,推动了嘉兴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据《辛亥嘉兴光复记》记载,参加组织领导辛亥革命的嘉兴籍革命志士基本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大部分人留学日本,其中较著名的来自嘉兴望族中的人士如下表。

组织领导辛亥革命的嘉兴望族志士表

姓名	学历	备注
褚辅成	日本东洋大学	同盟会、光复会组织人员
戚则周	东京警官学校	同盟会组织人员
龚未生	东京清华学校、东京振武学校	同盟会、光复会组织人员
蒋志新	大阪工专、长崎医科大学(肄业)	同盟会组织人员
方於笥	上海中医书院	光复会组织人员、嘉兴军政分府府长
沈钧儒	日本法政大学	光复会组织人员
张天方	上海震旦学院	参加嘉善光复工作

资料来源:董巽观:《辛亥嘉兴光复记》,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223页。

三、女子教育及其影响

上文已说过传统时期嘉兴望族的女子教育,都是在家族内部进行。虽然嘉兴望族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女性,但传统家族教育主要还是出于对女子德行的宣扬,要求女子恪守妇道。

而在近代,嘉兴望族提倡女子教育,兴办女学,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了学堂,和男子一样接受学校教育。其提倡者或思想开明或投身革命,激发了广大女学生的参与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给变革时期的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

首先它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女子的社会地位和女子受教育的问题,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社会风气的改变。石门振华女校就把培养男女平等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学校自编有《女子体操歌》:“姣姣这个好名词,我们决不要!

我既要我学问好,我又要我身体好。迨迨二十世纪中,吾辈也是英豪!”¹这有利于女性养成自立的性格,提高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冲击着社会上的陈规陋习。

其次,女学把基础教育与实业教育并重,知识灌输与技能培养并举,注重体操、图画、手工各科教学,从各方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如嘉兴女子师范学堂,在课程设置上,除政府规定的必修课外,还开设刺绣、缝纫两门工艺课,这使女子掌握了一技之长。同时,促使她们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女性开始独立谋生,动摇了社会上男主女从的关系,使三从四德的妇女道德标准逐渐受到冲击。特别是女子开始从事教育,成为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如1912年时嘉兴县立女子初等高等小学,有教师40人,其中38人是女教师。²师资队伍中有了女性的介入,打破了男子一统学校教育阵地的局面,对封建社会一切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又是一个猛烈的冲击。

再次,清末民初,嘉兴地区的望族开始兴办女学,接受了新知识的女子开始觉醒,成为具有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的新女性。她们开始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嘉兴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嘉兴各地女校师生关心国事,踊跃参加爱国运动。1912年10月,秋瑾灵柩由上海护送去杭州,行至枫泾(时属嘉善县境),丽德女子学校整队在车站迎候;至嘉善县城,明裔女学到车站迎祭;至嘉兴,各女校均前来奠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嘉兴地区,以秀州女校为首,各地女校师生一起上街游行,并发起成立了“救国实业团”³,用自己实际行动为之声援。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嘉兴进步学生团体中,已有不少女性的身影,张琴秋⁴就是其中的代表。

四、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它包括了人们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⁵它是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其实质表现为个人社会职位的变动和社会角色的转换,但社会流动的规模 and 特点则因时代的变化而各有不同。

在科举时代,“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下,即使嘉兴地区大多数家族并不轻视农、商等其他职业,但其家族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是科举入仕。家族中成员的流向主要是单一的“士人→入仕”或“入仕→士绅”的流动格局。家族中的士人可以“学而优则仕”,跻身官僚阶层,即使不能入朝为官,也可以凭借功名回到乡村控制基层政权。由于官僚职数的限额,只能保证具有较高“功名”的士子进入官僚阶层,对大多数士人而言,注定终身无法成就“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垂直流动,最终只能以功名身份居处乡野社会,承担起官与民的中介,维持着地方的秩序和发展。另外,官员离职后,基本上也会落叶归根,再次承担起家族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任。

而在近代,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士绅科举入仕之路被堵死,在这种情况下,新式的家族教育为族中子弟社会地位的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家族通过创办新学,积极鼓励和资助其族人学习新学,并资助他们进入新式学校,促使族人通过接受新学教育,获得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等新的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向社会各领域流动。

同时,这种新式的家族教育观念还为大部分具有科举功名的家族成员提供了重新选择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开始从权力空间日益狭小的乡村中走出来,通过接受新学教育,投身

¹ 转引自《嘉兴市教育志》第十四章《专记》。

² 转引自《嘉兴市教育志》第十四章《专记》。

³ 成立于1919年6月5日,详见史念:《从困顿到奋起——嘉兴:1840—1919》,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2辑,1996年,第267页。

⁴ 张琴秋,著名的红军女将领,1904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县,早年入石门振华女校。

⁵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求更为宽广的权力空间。如在浙江省谘议局议员中，嘉兴籍的 8 名议员中，来自嘉兴望族的就有陶宝霖、褚辅成、沈钧儒 3 人既具有科举功名，又分别留学日本。¹

以本文第二章近代嘉兴地区的望族新型人才表的统计为例，这 62 名来自嘉兴望族中的代表性的新式人才，其职业主要分布如下：

嘉兴望族代表性的新式人才职业分布表

职业	教育	党政军	商业	自由职业	其他
人数	21	19	8	7	7
百分比	33.87%	30.65%	12.90%	11.29%	11.29%

可见，在家族新式的教育观念的引导下，嘉兴地区的望族成员已开始了多元化的社会流动态势。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口的流动同时也是不同文化间的一种交流。嘉兴望族中外出求学的族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城市文明的熏陶，其思想、行为开始逐步摆脱传统的束缚。随着文化教育的转型以及社会流动的加速，嘉兴地区的望族成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变革的阶层。与此同时，由于族人和家族间的天然联系，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渗透到家族中去，使乡村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社会传统观念的转变。

¹ 详见傅怀峰：《清末江浙地区的政治参与：基于清末咨议局选举的个案研究》附表四《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出身背景》，胡春惠、薛化元主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2004 年出版。

结语

嘉兴是人才的摇篮,在这之中,更有一些人才辈出的望族。这不仅与嘉兴地区本身优越的自然地理、富庶的社会经济、以及崇文兴教的人文环境有关,还与该地区的家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是分不开的。本文以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为中心,围绕传统和近代家族教育各自的内容、特点为主题展开具体论述,讨论了两者在教育观、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上的不同。而考察家族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变迁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下面就嘉兴地区望族的家族教育进行总体评价,同时对以上各章节论述的内容做一总结。

本文认为,家族人才的发展无不受社会时代的影响。在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因而家族教育不可避免地服务于科举制度,在教化族人基本社会道德和普及族人读书识字的基本文化需要外,其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鼓励族人积极考取功名,朝着入仕为官的方向发展,从而来提高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此时的嘉兴地区也已形成了稳定的望族人才优势,不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可以从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得到印证。而在近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嘉兴地区的望族更是得风气之先,适时改变其教育观念,积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和资助其族人参与新学教育,促使家族中各类新式人才大量涌现,对整个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家族教育的产生、发展、变迁历程是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结合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往往影响着家族教育的发展,而家族人才在历史进程中的转变也能率先体现出时代、社会的发展特征和趋势,并引领着这种新的趋势,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

通过对嘉兴地区望族家族教育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在嘉兴地区教育的变迁过程中,嘉兴地区的望族扮演着重要角色,来自家族中的进步士绅和先进分子,在家族力量的支持下,积极兴办新式学堂,这为嘉兴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像李国祁通过对1895至1916年浙江省教育文化变迁过程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一样:“综观整个清季民初浙江新式文教事业的创建与演进,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的结论,欧美的传教士虽对此项事业的创立有启迎之功,但促使其生根成长的原动力仍在于当时社会领导阶层士绅的自觉。清季浙省的士绅阶层在本质上与内地省份有所不同。由于浙江地居沿海,省内盛产丝茶,故自中外通商以后经济极为繁荣,其士绅阶层的组成成分有相当浓厚的因商致富的色彩。因商致富的士绅由于与外人接触较多,很自然地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接受新观念,再加上浙江文风鼎盛,素有捐资兴学的传统,故浙省新学的兴起较他省为迅速普及。”¹嘉兴地区传统家族教育向近代新式家族教育的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是近代嘉兴商业十分发达,商贸日趋繁盛,望族中的士绅阶层因商致富,他们与外界接触较多,因而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够接受新观念,成为嘉兴近代新式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二是嘉兴素称文化之邦,自古以来,文风鼎盛,各望族素有捐资助学的传统,在近代也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家族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兴地区教育的近代化。

此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家族教育在今天仍由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家族教育十分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他们把修身作为其教育的重要方面。“教子孙,以身教,亦以言教。教以身,取法近在庭闱;教以言,后人犹可矜式”²,可见,长辈的行为举止会对孩子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为人长辈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为小辈们做出良好的榜样。

其次,嘉兴地区的望族之所以人才辈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子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家族重视文化传承,丰富的藏书文化,熏陶了一代代人。同时家族把教育作为家族

¹ 转引自郎友兴:《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²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序》,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传承的重要事业,族人亲自参与子弟的教育,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教育的内容和思想。因而,在现在孩子的教育上,家庭也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家长要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去,并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学校的教育上。

第三,嘉兴地区的望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族教育把读书和做人紧密结合在一起,“要做好人,必须读书”¹,因而,在现代的教育中,长辈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还要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培养孩子为人处事的能力。

¹ 《海昌祝氏宗谱》卷九《家范》，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一) 家谱

- 1、《海昌祝氏宗谱》，清光绪七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 2、《海昌洛溪许氏宗谱补纂》，清光绪九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 3、《海宁渤海陈氏宗谱》，民国二年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 4、《嘉兴谭氏家谱》，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 5、《闻湖盛氏家乘》，清宣统三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 6、《嘉兴竹林庙高氏谱》，清宣统年间钞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 7、《金氏如心堂谱》，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 8、《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嘉兴市图书馆藏。
- 9、《海宁查氏族谱》，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 10、《安化王氏宗谱》，清道光三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
- 11、《洛唐周氏家乘》，清道光七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 12、《海宁朱氏宗谱》，民国十二年刊本，海宁市图书馆藏。
- 13、《当湖陆氏枢密支谱》清康熙年间稿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4、《张氏家乘》，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5、《陆氏元和谱》，清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6、《清溪沈氏六修家乘》，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7、《朱氏重修迁浙支谱》，清宣统元年刊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8、《平湖徐氏世系》，民国五年石印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19、《当湖王氏家谱》，民国六年排印本，平湖市图书馆藏。
- 20、《枫溪郁氏家乘》，清光绪七年刊本，嘉善县图书馆。
- 21、《徐氏家乘》，民国十八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 22、《干溪曹氏家集序列》，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 23、《顾氏新谱》，2004年电脑排印本，嘉善县图书馆藏。
- 24、《干氏宗谱》，清钞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 25、《顾氏宗谱》，清同治元年，刊本，海盐县博物馆。
- 26、《任氏宗谱》，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 27、《张氏族谱》，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海盐县博物馆藏。

(二) 地方志

- 1、浙江通志馆纂修《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6册，浙江省图书馆誉录，1982年。
- 2、光绪《嘉兴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 3、光绪《嘉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 4、民国《平湖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 5、光绪《海盐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 6、民国《海宁州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集》，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
- 7、民国《新塍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 8、民国《濮院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 9、民国《乌青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 10、嘉兴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1、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 12、嘉兴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3、嘉兴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文化志》，杭州出版社，2000年
- 14、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
- 15、沈艺林主编《海宁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16、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7、宋立宏主编《海盐县教育志》（上），海盐县教育局，1990年。
- 18、王店镇志编纂委员会编《王店镇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
- 19、新塍镇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 20、盐官镇志编写组编《盐官镇志》，南京出版社，1993年。

（三）文史资料

- 1、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40期，2005年。
- 3、陈伟桐主编《嘉禾春秋》第2辑，1996年。
- 4、嘉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
- 5、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嘉善县文联编《嘉善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 6、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盐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
- 7、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海盐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1年。
- 8、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
- 9、桐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桐乡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
- 10、海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海宁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海宁人物资料》第1辑【出版时间不详】。
- 11、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宁人物资料》第8辑，1997年。

（四）史料汇编

- 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二、文集、传记、年谱类

- 1、《山东教育》杂志编《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知识出版社，1982年。
- 2、姚淦铭编校《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 3、陈铭：《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
- 4、《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 5、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 6、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年。
- 7、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 8、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9、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
- 10、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
- 11、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
- 12、柳和城：《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13、赵遐秋：《徐志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 14、盛兴军主编《丰子恺年谱》，青岛出版社，2005年。

三、论著类

-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2、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1991年12月影印本。
- 3、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

- 4、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 5、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 6、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 7、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8、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9、李国均、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10、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
- 11、侯玉杰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
- 12、党明德、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 13、洪永铿、贾文胜、赖燕波：《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四、论文类

- 1、吴大琨：《笔谈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11期。
- 2、韩凝春：《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6期。
- 3、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4、许永涛：《清代族规家训的社会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八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 5、张发祥：《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抚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 6、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 7、钟春翔：《简析清代江南的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 8、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9、郝锦花、王先明《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文史哲》，2002年第5期。
- 10、李浩：《桐城张氏家族教育传统试探》，《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
- 11、郎友兴：《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 12、傅怀峰：《清末江浙地区的政治参与：基于清末咨议局选举的个案研究》，胡春惠、薛化元主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出版。
- 13、林济：《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